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工人家史。口述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訴了地主、資本家、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們的罪恶。解放前，工人兄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经受了敲骨吸髓的剝削，受尽了辱罵、鞭打和摧残，生活不如牛馬，終日掙扎在死亡綫上。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劳动人民終于打碎了沉重的枷鎖，获得了解放，过着幸福的生活。过去的仇恨，激励着他們更加热爱新社会，积极建設社会主义，并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些忆苦思甜的文章，对年青的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

目 录

我这一家人.....	1
血泪仇.....	11
说说我的“两死一活”.....	17
地下奴隶.....	23
我真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倾吐.....	30
虎口夺生.....	38
在帝国主义开办的厂子里.....	51
九死一生.....	56
搬运工人的血泪.....	61
过去作牛马 今天是主人.....	69
从地狱到天堂.....	74
记住这血仇泪恨.....	83
我在旧社会的遭遇.....	92
“小鬼”造反.....	103

我这一家人

沈阳毛织厂工人 刘蓬子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威海县，爸爸是渔民，一辈子受尽渔霸的压榨欺侮，一次出海遇到风暴，连人带船都没有回来。为了活命，大哥也走上父亲打鱼的路子。他白天黑夜干，一家人还捞不上一顿粥吃。一个大雷雨天，大哥不忍心看着一家人挨饿，冒着暴雨去打鱼，谁能想到他刚走到码头就被电死了。

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又落到二哥身上。那时他年纪小，体格弱，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也只得去打鱼。他力气小，又不会干，成天成天打不上鱼来。弄不到吃的不说，渔霸还逼着缴船租网租。二哥又气又急，心火上攻，闹起眼病来，疼得他在床上来回滚，脑袋直往墙上撞。那年头，穷人哪来钱治病？日子拖久了，黑眼珠慢慢变成白色，二哥成了瞎子。从此，他再也看不见妈妈，看不见我们了。

在威海日子实在难过。看人家闯关东，二姐、三姐就跟着一个乡亲到了奉天（沈阳）。妈妈带着二哥、小哥和我守在家里，天天挖野菜吃。妈妈看看这个，摸摸那个，都黄得象蜡，瘦得象柴。“得另打主意。”妈妈一个人叨咕着。她把家里的东西归拢归拢，嘱咐二哥先在家等信，便领着小哥和

我，到奉天找三姐。

东问人，西打听，好容易找到了“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即麻袋厂）。妈妈向看门的说了多少好话，才把三姐找了出来。一见面，我楞住了，这是我的三姐吗？原来圆圆的脸，变得枯瘦焦黄，一对灵活的大眼睛变得呆滞滞的。不见三姐才一年，她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三姐看见我们，先是欢喜，随后就发起愁来，低声说：“你们怎么也来到这个陷人坑！”从三姐那儿，知道二姐转入另一个工厂，后来结了婚，随同姐夫去大连了。

明知道日本鬼子的麻袋厂是个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也只得睁眼往里跳。三姐做工连自己都养不活，哪里还能顾得我们三个！求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口舌，才准我们进麻袋厂干活。我那年才九岁，站起来比桌子高一点，就开始了活地狱一样的童工生活。

我还清楚地记得头一天上工的情景：一个满脸横肉的大胖子，领着我们走过一座座屋子。另外一个中等个男人，带着我进到准备车间。一进门，轰隆轰隆的机器声，震得我头发昏；屋里一股腥臭味，熏得我直想吐。我一眼看见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在吃力地往机器上举大线轱辘。我越看越害怕，正在发楞，那中等个的男人大声骂我：“你是死人？站着干啥？好好跟他们一起干！”我这时偷偷瞅了瞅他，这个人大约三十四五岁，满脸连鬓鬍子，戴顶黄色的大沿帽，上面有两道红杠，穿一双皮靴子，手里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藤棍。他的两只眼睛瞪得圆圆地狠盯着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工头，名叫王国晨。

提心吊胆地干了几天，每天十二小时活，累得我腰酸腿

疼。这一回，摆麻穗子，一捆少说也有二十斤。我往下拿够不着，一下弄散了。王工头象恶狼似地扑过来，不由分说，朝我腰上狠狠一脚，我一个踉跄跌出去好几步远，还没等我爬起来，一阵乱棍象雨点一样落在我头上。从此以后，打骂不离我的身。头上鼓满肿疮，身上尽是鞭痕，睡觉时，怎么躺也睡不稳。白天受了气挨了打，晚上见了妈妈就吐吐苦水。妈妈含着眼泪一边听，一边抚摸我的头，我常常哭着说着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后来，我发现妈妈、三姐、小哥和所有的工人，脸上手上都带伤，才明白原来他们也一样挨打受气，我就再不向妈妈诉苦了，眼泪直往肚子里咽。

挨打、受折磨，是为了吃一口饭。可是，我们那时吃的又是什么呢？一年到头是橡子面、霉高粱米、臭豆饼、烂倭瓜。就是这些，也很难吃饱肚子。妈妈脚小，走路慢，常常是等我们一家人聚齐了赶到食堂，干的早就没有了，只剩泔锅水似的豆饼汤，上面还浮着一层黑机器油，舀一碗闭着眼睛灌进肚子，比不吃还难受。但不吃又怎么办呢！我们住的号子（宿舍），夏天屋小人挤，气味难闻；冬天象个冰窖，墙上挂满冰霜。躺在冰凉的砖炕上，我和妈妈、三姐三人合盖一条薄棉被，冻得牙齿直打架。每天起床，腿脚都冻僵了，不能迈步，要扶着炕沿溜一圈才缓过来。现在，我身患比较严重的关节炎，就是那时做下的病。说到穿衣，那更别提了。几年做不上一件新衣，破得不能再补了，就用麻把窟窿扎上，看着真揪心。

一家人落到这般田地，万恶的旧社会还不放过我们，灾祸又一桩接一桩临到我们家。

在麻袋厂做了几个月。有一天，我和妈妈都是夜班，白

天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躺在炕上睡不着。忽然，听见号子外吵吵嚷嚷，有人喊：“找关里来的老太太！”媽媽一骨碌爬起来，嘴里叨咕：“可別是瞎子找来呀！”娘儿俩赶到厂門口，那儿围了一群人，舍监正在用皮鞭子往一个人身上抽，一面罵：“瞎子不去死，跑这来找魂！”那人拄着棍，跌跌踉踉地閃躲。“是瞎哥！”我的眼睛尖，連忙和媽媽跑上去求舍监住手。媽媽扶着瞎哥，我在后面跟着，走到厂子外，找块石头坐下。瞎哥和媽媽說一陣哭一陣，我也跟着嗚嗚哭。瞎哥仅有的一点钱和东西都在半路上让人騙走了，几頓沒吃飯，媽媽向別人借点钱，让他先买个餅吃。舍监不让瞎哥在女工号留宿，瞎哥只好走了。几天后，瞎哥又来一次，这回更不象人样了，脸上身上全是泥。他摸着媽媽的手說：“娘，我再來让你看看。我是个废物，別惦着我了，好好养活弟弟妹妹吧！我这回走，到哪算哪，死了你也別难受……”媽媽捂住瞎哥的嘴，說：“別說瞎话，慢慢想办法……”瞎哥又把我拉到跟前，摸摸我的脸。然后慢慢站起来，拄着棍，一步一探地走远了。媽媽象傻了似地站在那儿，瞎哥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她还站着不动……

瞎哥走后，再也沒来过。听人说，臭水沟里死了个瞎子，旁边还有根棍。媽媽一句话沒說，象丢了什么，常常坐着发呆。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有一天，天刚转冷，下着小清雪，我在車間干活，聞着一陣陣烟火味，大家正在奇怪，忽然小哥慌慌张张撞进来，冲着我喊：“軟麻車間着火，咱娘熏死了……”“娘！……”我扔下活就跟着小哥跑，工头一把拽住說：“死了个老太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走了，活誰干？”

工头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后来，我趁他不注意，一转身溜出了車間。

媽媽已经被抬到車間外边，披头散发，灰色罩衣烧了个角，脸铁青的，眼睛半睁半闭。我和三姐小哥呼天搶地喊娘叫媽，媽媽一动也不动。日本鬼子領着工头来了，直劲攆我們走，说在这儿影响大家干活。还是一位好心的老大爷，告訴我們媽媽也兴沒死，叫烟憋住了，放放烟可能緩过气来。几个人把媽媽抬到空气流通的地方，掰开她的嘴，又掐脖子，又推搡，果然一团团黄烟冲出来，足有半个钟点，媽媽才喘过一口气来。可是醒过来后，神志老不清醒，好几天不认识人，总



比划着喊：“火，火！”

后来，我才知道，軟麻車間着火那天，工人們都急着往外跑，媽媽当时吓傻了，站着不动，看人跑光了，她才想到逃命。就在这时，工头来了，他怕火蔓延到别的車間，命人把車間的門一扇扇都关死了。軟麻車間里滿屋黑烟，媽媽推推这扇門，晃晃那扇門，可着嗓子喊：“快开門，还有人哪！”“开門，放我出去啊！”工人央求工头开門，心比蛇还毒的工头，用鞭子抽散人群，恶狠狠地说：“死个老太婆有啥？火烧到别的車間你們担得起？”人們听见媽媽把車間几扇門晃遍了，哭喊声也越来越小，后来沒有了声息。工人們气愤极了，逼着工头把門打开，只见媽媽栽倒在一扇門旁边。

媽媽不能上工，舍监不让捎吃的，我和小哥偷偷带块窝窝头，都纏在小腿肚上，要不准給搜了去。媽媽稍稍见好，工头几次三番命令她上班，威胁她再不上班就开除。媽媽只好带着病，忍气吞声去做工。气、急、惊、吓凑到一起，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瘦得不象人形，工头还照常打她罵她。媽媽总说：“穷人什么时候能见青天啊！”可怜她到底沒能熬到见青天那一天，在日本投降后四、五天，就扔下我們死了。

媽媽死了以后，我們这三个孤儿的命运更惨了。万恶的国民党代替了日本鬼子，換湯不換药，工人的生活照旧那么苦，那些工头依旧騎在我們脖子上。在媽媽死了以后，接着遭受不幸的就是我的三姐。在旧社会象她那样的青年女工，除了挨餓受累以外，还有一层苦难——工头的侮辱。工头对我三姐总是糾纏不放。三姐宁死不肯屈从。工头恼羞成怒，便想方設法折磨她，刁难、找碴，动不动又打又罵，三姐都咬牙忍着。有一次干活时，右手食指叫机器打了，工头不让

去治，要她继续干活。她的手指越来越肿，后来竟有小擀面杖那样粗，手背肿得象馒头。工头怕闹出人命，才让三姐去医院。X光一检查，手指骨全变黑了，只能把食指割掉，否则右手难保。那时的医院，哪把工人当人看，动手术时不给打麻药针，生往下割，三姐疼得死去活来。割完回工厂时，沿路昏倒几次，血不停地往下淌。可是黑心的工头只让休息半天，第二天三姐上班，一边干活，手指一边往下滴血。

三姐在肉体和精神折磨下，后来又得了肺病，大口大口吐血。强挺着又干了一年多，实在支持不了才离厂到一个乡亲家歇着。在她临死前几天，轻轻对我说：“蓮子呀，三姐也要跟着妈妈去了，再没亲人照看你，你自己要留心身体啊！我听人说过有个八路军，专门帮助咱穷人，你好好等着吧！也许有那一天……”可怜的二姐在二十二岁正好的时候，就叫吃人的旧社会吞噬了。

三姐才死，横祸又临到小哥身上。他在街上叫国民党的卡车撞了，左眼上眼皮硬撕了下来，挂到脸上，整个鼻子被撞没了。厂方说他模样怕人，把他撵了出去。小哥没处存身，只好躲在破防空壕里，白天拣煤核，换点吃的。我偷着去看他，见他在泥水沙土里爬滚，心里象刀扎一样。

不过短短十几年工夫，万恶的旧社会就夺去了我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的生命，害得我和小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骨肉离散，家破人亡。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统治下，劳动人民有我们家这样遭遇的，何止千万！这不是一家的不幸啊！

我在绝望中，常想起三姐说的八路军，不过，八路军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又在哪呢？

我盼望的这一天到底到来了：1948年11月，解放军进了沈阳城，工人解放了，翻身了！我们工人开始过真正的人的生活，再不是任人欺侮的牛马。不久，我参加了厂里组织的歌咏队、秧歌队，活了十六岁只知道抹眼泪的我，生平第一次放开喉咙唱歌，挺起腰板扭秧歌。

这些无恶不作的工头，在解放后，装出一副副老实样，有时还在工人面前讨好。我们早看清他们的狡猾和恶毒，谁也不去搭理，恨不得咬他们几口才解恨。共产党、人民政府真懂得工人的心情，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王国晨和另一些坏蛋被依法逮捕，还开了千人以上的公审大会。那些胡作非为、作威作福的工头，在站起来的工人面前，吓得面如土色，低着头瑟瑟发抖。工人一个接一个指着恶工头的鼻子，控诉他们压迫、欺凌、污辱工人的罪行。我也在众人面前，大声说出了积压在心底的刻骨仇恨，替死去的亲人伸冤报仇。全场喊起响亮的口号：“打倒工头，讨还血债！”“工人阶级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万恶的工头被枪毙了！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了！人民掌握了政权！我们成为国家的主人！

这十五年来，随着国家一天天繁荣富强，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自从共产党的干部到沈阳麻袋厂的第一天起，我，刘莲子，名字没改，人没变，工作的地方没调换（我1962年4月才到沈阳毛织厂工作）。但是一切都变了，翻天覆地般变了。工厂党的领导干部、厂长、妇女委员都亲切地叫我：“小莲子，小鬼！”见我年纪小，身世苦，特别的关怀我，照顾我。妈妈是最疼我的，可是在吃人的旧社会，她只能用眼泪洗抹女儿的伤痕。而共产党的干

部，替我們穷人撑腰，还教导我們应该怎样活下去。以前，我們忍气吞声，連咳嗽声稍大些都会犯规；如今，我們可以在大会上，在领导面前，提出自己的意见。工厂是我們自己的，由我們自己来管理，每个工人都享受着 he 应得的权利和福利待遇。每天不到钟点，我就急着騎自行車去上班，（再不象以前上車間走一步退两步，最好总也不到达。）上班前，換上洁淨的工作服，下班后，用肥皂洗干净手和臉，心里象攔着一块糖，总是甜滋滋的。几年前，我得了腎炎，厂里让我休息了五个月，想尽办法給我治疗，还常常給我送苹果送鸡蛋。这种时候，我怎能不想起屈死的三姐？如果在新社会，她何至于死？

解放不久，我就和同厂的一个工人結了婚，我們一同受过旧社会的苦。婆婆也曾在旧麻袋厂做过工，都是一个根子上的人。“家”就在麻袋厂宿舍里。墙刷得白白的，冬天炕烧得热乎乎，鋪的盖的穿的用的逐年都要添置一些。當我們坐在热炕上，谈起冰窖似的号子，三人合盖一床薄被的狭炕，令人不忍耳聞的呻吟，不忍目睹的惨状，哪能相信这些情景原来就发生在这些宿舍里！

我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今年十四，二女儿十岁，小儿子六岁。他們生长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和我們姐妹兄弟的童年不能比。

我的媽媽一輩子生了三男四女。有儿有女，該是有福的。然而，哪个孩子給她带来过福气呢？她自己劳累一生，沒有过一天舒坦日子；她眼看着孩子們一个个受罪惨死，没办法保护。旧社会福字不属于穷人。而现在，我当了三个孩子的媽媽，完全享受到作媽媽的权利和幸福。从怀孩子那天起，

就受到种种照顾，生孩子有近两个月的休假，工会送来鸡蛋，同志们来贺喜。在旧社会，生孩子是女工最大的不幸，哪里还有什么喜？生了孩子，当妈妈的就要被开除。好容易想法瞒过去了，把孩子偷偷送来喂奶，给工头看见了一脚就踢老远。我们现在能按着规定时间去哺乳室喂奶。我知道，幸福不是孩子们带给我的，是共产党、毛主席把穷人救出苦海，我才有了和我妈妈完全不同的命运。

党也救了我的小哥。解放后，他去大连一个残废教养院，在那里一个工厂做工，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力。他还修补了面容，生活得很幸福。

一句话，我得到了一个新中国的工人所能得到的一切。我生活在幸福中，过着蜜糖一样的日子。但是，我并没有忘记过去。我怎么能忘记过去呢？在我的一家中，我是最幸运的，我多么希望能够让那些受了一辈子苦，死不瞑目的亲人也来尝尝今天的幸福滋味啊！他们被无情的旧社会吞掉了。这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海深仇啊！

在新社会生长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家庭的遭遇怎么会这样惨，怎么那么多倒霉事都落到一个人身上。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就叫旧社会哪！现在，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要让孩子们都知道妈妈小时候的“家”是什么样的，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刘莲子一家的变化，让大家永远不忘过去，更加热爱今天。

(吴秀琴 整理)

血 泪 仇

退休老工人 敬文升

1945年，我在河南省漯河华信烟厂摇机。烟厂的掌柜是毛金修、閻洪宾、袁明庆，还有一个工头叫胡文甫，外号叫胡大胖子。那时工人们为了混碗饭吃，给他们没明没夜地干。我记得这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掌柜只给每人发了一块多钱。

这年腊月，人们都在准备过年，烟卖的特别快，资本家看到有利可图，就叫胡大胖子监工，让工人白天晚上连着干。胡大胖子白天睡大头觉，夜晚掂着棍子到厂房来回转，谁要是一打盹，劈头就是一棍。那时候我是炕烟工。唉！提起炕烟，那才真是活受罪。那时候炕烟用的是柴炭，炕房内象火山一样，燎得人喘不过气来。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夜里，风很大，天阴森森的，当时，我已经昼夜不停地干了很多天，又累又热，头轰轰的，走起路来光想晕倒，饭也吃不下去。我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就壮着胆子去向掌柜请假。我说：“毛掌柜，我病的实在不能再支持了，想请个假去看看？”他听说我要请假，两眼一瞪，说：“你请假谁替你炕烟！要看病你找个人来替你！”

假没有请准不说，反而当着许多人把我痛骂了一顿，说

我不好好干。当时，我敢怒不敢言，两眼含着泪，拉着两条沉重的腿又回炕房去了。这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我一进炕房，大堆炭火烧的正旺，一股热气向我扑来。我走了几步，觉着天旋地转，眼冒金星。我刚想离开火炕，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便晕倒在火堆上了。清醒过来后，我一边挣扎着往外爬，一边呼喊着重人呀！救人呀。因为起了大风，加上烟机



也在呼隆呼隆响着，我少气无力地喊着，怎么喊叫也没有人来。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爬到了火堆的一边。就在我想站起来功夫，我又第二次晕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李順海是个开车工，夜里他出来解手时，听见喊救命的声音，而且，喊声是从炕房里传出来的，他想到我在炕烟，就急忙跑到机房向大伙说：“不好了！有誰在喊救命，怕是老敬吧！”工友一听，马上涌出七八个人，直向炕房跑去。老工人黃洪山提了个灯笼跑在前头，进屋一看，天哪！我的衣服早已烧成了灰，两只腿烧的吱吱响，骨头已经露了出来。看到这种情景，大伙啥也不顾，就把我用木板抬了出来，有的给我找茶，有的给我找药。

资本家們都在院子东边的楼上住着。李順海、李順喜等一群工友，跑到资本家門口拍着門说：“毛掌柜、閻掌柜，老敬的腿烧坏了！烧坏人啦！”可是，喊了半个钟头，没有一个人搭腔。后来，大伙看资本家不理，就兑了几个钱，准备派人到街上去买救急药。那知胡大胖子那家伙偏偏又不叫开門。人在危急，那能迟延？大伙又到东楼下去喊叫，掌柜仍然不起来。更可恨的是，这时胡大胖子还逼着大伙非上工不可，大伙没有理他。一直鬧到下两点了，还是无效。怎么办？大伙一合計：“停机！”这个办法果然有效，掌柜听着机器停了，才打开了大門。大伙刚把我抬出大門，胡大胖子就砰的一声把大門落了鎖。

医院就在烟厂的对門，是个私人小医院。到那里他們一看伤勢那么严重，张口就要四五百元，并且还要资本家亲自立字据。大伙一商量，决定一方面去找资本家交涉，另一方面有钱的回去兑钱。交涉没有成功，资本家不給写字据。正

在我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帮机的工人靳占把他三年多积攒下来的四元五角钱拿了出来，给我买了止痛药，打了止痛针。医院看我们没有钱，说治不了，硬逼着将我抬了出来。

当天夜里约有四点多钟，风越刮越大，飞沙走石不住地打在我脸上和腿上，腿痛的更加厉害了，半小时就晕过去几次。我躺在木板上，喊叫一阵，晕迷一阵。这时，大伙又把我抬到了基督教会医院。那时候的医院可不是为咱办的呀！那是有钱的抬进去，无钱的拉出来。

一抬进医院，一位戴眼镜的医生斯斯文文地来到了我的身边，他一看我的伤势，说声“住院”扭头就走了。

一听说叫住院，大伙想着有希望。可是，到会计室一问，会计开口就要先交五百元。天哪！向哪里去弄五百元钱呢？只得再去找掌柜交涉。

工人王起德见到掌柜，一说要借钱，掌柜板起面孔，恶狠狠地说：“烧伤是他自己不小心，要治你们给他治，与厂方无关。”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二十四日中午，我仍然在医院门外边的一块木板上躺着，两条露出骨头的腿冻得发紫，伤势越来越重。几个工人弟兄急得团团转。无奈，只好给医院说好话，并言明集体立约作保，医院仍不同意。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时，工友们商量决定派黄洪山等几个人再去找资本家。厂方看着不管要出大事，才勉强答应派职员陆光先去医院接洽，立了字据。

到医院以后，经医生一检查，决定要锯腿。锯腿对我来说，不过是保存一条命，可是对资本家来说，钱比我的命还更重要。资本家袁明庆、工头胡大胖子就又使出了鬼计，他

們一方面向醫院交涉要抽回字據，說經濟和人身廠方不負責任。另一方面又派人叫我父母親來，想來個順水推舟。工人們聽說資本家要抽合同，都一齊趕到醫院來，同資本家講理，吓得資本家沒敢再提抽合同這事。可是，我的父母親到底是來了，老人家看着我那不象人形的樣子，坐到我身邊，哭的死去活來。

二十九日下午的時刻，我永生也忘不了：最初我昏昏迷迷地躺在手術床上，什麼也不知道，當我醒過來時，我的雙腿已經從膝蓋下邊鋸了下來。

腿鋸下來後，因為不給好藥，加上缺血，傷口一直往外流血水，慢慢地開始腐爛了。就這樣，在醫院躺了一兩個月後，傷口不僅沒有長住，潰爛的地方越來越大，傷勢更加惡化了。

醫院看情況不妙，在一天夜里，又把我抬到了手術室，約摸有兩三個鐘頭的功夫，他們又把我抬回了病房。第二天一醒來，才發覺我的兩條腿又被鋸去了一截，從大腿根下約有兩三寸長的地方鋸下的，就是現在這樣。當時，我一看又鋸掉了一截，就又暈過去了。兩個月以後，傷勢還沒有完全好，資本家毛金修、閻洪賓就把我趕出了醫院。出院後連廠都沒有進，就被他們開除了。

象我這樣的人，要不是解放翻了身，我早不知道餓死到那裏去啦。解放後，我們成了國家的主人。我家六口人，生活過的滿不錯。黨為了照顧我全家的生活，讓我愛人秀英到漯河煙廠去工作。我愛人每月三十多元工資，不足部分，廠里工會組織定期進行補助，冷了給棉衣，熱了給單衣，連小孩上學的學費也都是廠里給拿出來的。大兒子現在是解放軍

五好战士，大女儿玉凤也上了学。我万分地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过去的苦我们一定要记住，不仅自己要记住，还要把这些苦当成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让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工人的血泪仇。

（吕桂兰、应时雨、王今川、宋秉坤 整理）

说说我的“两死一活”

济宁市火柴厂包装工人 房永秀

我今年四十岁了，有二十六年是从地狱里熬过来的。新社会，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我和我这一家子真是掉在福窝里了。旧社会给我的苦和新社会给我的甜，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里就说说我的“两死一活”吧。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微山县蒋家庄，一家六口。我爹给人家打短工，我娘领着我们姐弟四个要饭糊口。在我三岁那年，爹就死了。爹一死，日子就更难熬了。没过几年，娘就拉扯着我们姐弟四人，离开老家，跑东村、串西庄，逃荒要饭来到济宁市。那时候要点吃的可真难，穷人填不饱自己的肚子，哪有吃的打发要饭的；有钱人的心比恶狼还狠，“大爷、大娘”地叫破了嗓子，也要不到块干粮。挨饿、受冻、被狗咬，是家常便饭。后来娘儿几个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十岁那年，娘就给我十三岁的姐姐找了主。过了三年，娘又托人给我找了个丈夫。

我原来以为到了婆家就不挨饿受罪了，谁知到了婆家受的罪比在娘家还要厉害。过门的那天，丈夫把我领到一座破庙跟前，对我说：“到家了。”我看附近没有房子，心里就纳闷，“这家在哪儿呵？”仔细一看，原来在破庙墙脚下搭的一

个小窝棚。我丈夫王洪荣是个木匠，那时候一年也找不到几天的活。在我过门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日头平西啦，还没有动烟火。当时我想：“怎么婆婆不做饭，也不叫我去烧锅呀？”原来婆家也是没米下锅，一直饿到第三天，丈夫到外面给人家修修箱子钉钉板凳挣来几个钱，买来二斤高粱面才算吃上了婆家的第一顿饭。在我十四岁那年，实在饿不下去了，我就东跑西跑托熟人介绍到火柴厂去包洋火，事先我也听说过振业火柴厂的厉害，可总比挨门要着吃强啊。

过去的振业火柴厂，是出名的二衙门。厂的四周有电网，出入口有把头搜腰，那把头个个都是又凶又狠，工人走不好就打。厂里有专门打人用的“青红棍”，工人们挨打挨骂受侮辱是常有的事，哪个工人不是被打的青伤压红伤。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上班，我们就这样顶着星星进厂，戴着月亮回家，一天拚死拚活地干十五、六个钟点，一个月的工钱还不够买三十斤红高粱。糠菜窝窝、麸皮“糊涂”是我们的好饭，有时连这些也吃不上，柳树芽、槐树叶，连杨树上的毛毛虫都吃过。那时候，咱们工人真还不如资本家的狗。厂里资本家养着一条黑狗、一条黄狗，还专门为这两条狗盖了一座新瓦屋，整天拿牛羊肉喂它。狗连雪白的馍馍都不吃，衙的各处都是。我十八岁那年，丈夫天天找不到工作，我月底领下的几个钱，买点粮食吃不上几天就光啦。一次，我一连两、三天没吃一点东西，饿的我头晕眼花，干着干着活就晕倒了。这天下午，资本家的大黄狗衔着雪白的馍馍掉在车间外面了，我看到雪白的馍馍被狗糟践，心里气得慌。把头郭闾王发现我隔着玻璃往外看，开口就骂：“穷贱骨头，饿死鬼，不好好干活往外看什么？等狗拉下来再给你吃吧。”当时我真是气

得手脚发抖，刚一张口想辩驳两句，郭阎王就说：“你还敢强嘴！”抡起扫帚苗子就往我脸上抽，抽得我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我又恨又气。黑天下了班，迷迷糊糊地往家走，白天的事情直在我脑子里打转，心想穷人还不如资本家一条狗，活着实在没意思，倒不如死了干净。越寻思越窝囊，不知不觉走到老运河的码头上，心一横，解开褂子把头一蒙就跳下去了。谁知道正赶上附近一家人家闹气，人家打着灯笼找自家人，把我捞上来了。等我省人事以后，我哭了。我想：“死都死不了，该我活受呀！”

跳老运河没死了，可叫河水呛坏了胃，一个劲地吐，过了三四天还吐黄水，打那以后，就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就这样又半死半活地熬过了六七个年头。在我二十五岁那年，更不幸的事又压在我的头上了，孩子他爹得了痢疾病。这病要攔在如今，真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钱看病！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受尽折磨离开了人世。孩子他爹这一死，日子就更难熬了。在那个社会，物价天天上涨，我一个妇道人家，拚死拚活一个月挣那几个钱买不了二三十斤高粱，拉扯着两个孩子可怎么活呀！从那以后我的眼泪就更多了，天天下班回到那间破窝棚里，看见两个苦命的孩子，眼泪就止不住，有时从天黑哭到天明，没过两个月我的两个眼就哭瞎了。那年月，好好的人，资本家还说不要就不要呢，何况我已经瞎了。果然，还没过一个月，资本家就叫人捎信来把我解雇了。天哪！这真是破屋偏遭连阴雨——步步逼人哪！我想，这回我可真没有活路啦，领着孩子去要饭也摸不到门呀！所以我又第二次走上了寻死这条路。可是死也得找个死的地方啊。我想来想去想起了一天门的那

个坑，坑边上很少有人，跳在里面就能离开这吃人的社会了。可是我这个瞎子，怎能摸到一天門呢？就在解雇我的第二天，我把大孩子叫在跟前说：“跟生，你领着娘，咱到一天門去玩玩。”孩子是听娘话的，乖乖地就领我去啦。半路上，我摸着孩子亲一阵，哭一阵，等我走到坑边的时候，我的一



双看不见啥的眼，直淌眼泪。两只手抚摸着孩子的头说：“娘能摸到死的地方了，你回去吧，回到家领着弟弟要饭吃、活着吧！娘对不起你们，娘实在活不下去了。”七八岁的孩子也懂些事了，听说娘去寻死，马上攥住我的胳膊大哭起来。在我往水里走去这十几步路上，狠心摔他几次也没有摔开。当我走到水边刚想跳到水深地方去，孩子抱住我的大腿一下子跪到了水里，一边哭一边央求着：“娘啊！你死喽，谁管我和我兄弟呀。娘啊！你不能死啊！娘啊！娘啊！……”大家想想，这会儿当娘的是个啥滋味呀。我的心真是比针扎的还难受哇。哎！为了孩子，再多活一会吧，回去和孩子們饿死在一块吧。

1948年9月，济宁市解放了，我和全国的受苦人一样，从此翻了身。解放后，为了治眼，党给我找了中医又找西医，吃药扎针都不管用，钱却花了一千多块，我心里真愧的慌，就不想再治了，我对领导上说：“我的眼是不行了，我没有给国家出一点力，倒给国家毁了这么多钱，别治了，您给我找点活干吧。”领导上斩钉截铁地说：“永秀同志，别没信心，旧社会把你折磨成瞎子，新社会一定要让你重见光明，你要相信党，党一定要治好你那被旧社会逼瞎了的眼睛。”以后光大夫就换了四五个，不到两年的功夫，我的眼睛真治好了。当我睁开眼睛重见光明的时候，世上变了样，工厂更变了样，工人们自由自在，喜笑颜开。这回我又流出了热泪，不过这是感动的眼泪，高兴的眼泪。眼好以后，1951年我又重新走进了工厂。在党的亲切培养教育下，1953年4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提拔为火柴厂包封工段段长。现在我的大儿子跟生已经结婚了，儿子、媳妇都有工作，并且已有

了孙女。旧社会我二十六年没有盖过被，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可现在全家人吃的饱，穿的暖，样样称心如意。说实在的，在旧社会受了二十六年的熬煎，落下了一身病，干活用力大了就冒虚汗，特别是犯胃病的时候，翻肠倒肚折腾得真够受。可是越是疼得厉害的时候，越使我想起旧社会的可恨，使我感到新社会的可爱，想起党的恩情比天还高，比海还深。想到这里我浑身是劲，干起活来就由不得我了。每天下班铃响了，都是多包一盘洋火，还想再多包一盘。心想：“我干的再多，也没有党对我的恩情多。”

地下奴隶

烏魯木齊六道灣煤矿老矿工 热衣木·木沙

我原是新疆喀什的人。家里很穷，只依靠租种巴依（地主老财）家里一点盐碱地生活。可是，由于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地又薄，再加上还得给巴依家里打杂做活，地里的收成很少，总是去了租税就没有吃喝。因此，一家十来口人时常挨饿。到我八岁那一年，就给人家放羊。有一年，赶上天旱，巴依硬霸住水不给穷人们灌田，庄稼眼巴巴地枯死了，到秋收我们打的粮食连租税都不够。可是巴依为趁歉年高价卖粮，就硬逼着我爹把租子一笔交清，我爹没有，巴依用鞭子把我爹狠狠地打了一顿，又交给了拜格（国民党的伪保长）。拜格逼了一阵，看看实在没有油水，最后判定叫我给巴依家干四年活去抵债。

那一年，我才十岁。因为常挨饿，长的个子很小，站起来也只是刚刚超过一只大尾巴羊高。但是巴依却不把我当成孩子看，上工的那一天，就交给六十多只羊，白天让我出去放，晚上回来还得劈柴干零活。一天忙到晚，巴依的老婆还要从墙洞里监视着我，即便是喝口水，擦把汗，她也说你是偷懒，不挨打，也得挨她一顿骂，一年挨的鞭子记不清。我晚上住的是羊圈，吃的一天只有两顿稀玉米糊糊，饿得我浑

身出汗，眼睛冒蓝花，还得照样去干活……

四年总算是熬过去了。然而，我前脚刚从这个巴依家里出来，后脚却又迈进另一个巴依家的门槛去抵租子。唉！真是天下的巴依一样狠，天下的烏鴉一般黑。这个巴依不仅叫我放他自己的羊，而且还从外面揽来很多羊叫我放，他好从中取利。他怕把羊丢掉赔了钱，就让我把羊赶到没有人烟的戈壁上去。从此，除了每月给我送两三次干粮的人以外，就很少见到人了。整天看到的，只有那二百多只羊和荒凉的戈壁。我就和这群羊，一起顶着火毒的太阳到处流浪，一起瑟缩着身子卧在沙滩上过夜，遇上雨天，又一起从头淋到脚。可是，羊天天都有草吃，而我遇上没有干粮时，只好采一把沙枣充饥。我就这样风雨饥寒地给巴依繁殖了不少的羊，赚来了不少的钱，但他却连一分钱也没有给过我。一直到我二十岁那一年，眼看我的弟妹们也长大了，也能干活了，却遇上抓壮丁。有钱能使鬼推磨，巴依和拜格勾结在一起，把二十六个人都派到我们穷人家的身上。我爹没有钱送礼，一个劲儿说好话央求拜格可怜，拜格却把眼睛瞪的象牛眼珠子一样大，吼道：“住口！要去就好好的去，不去就拿绳子绑了去！”我气的扶住我爹说：“爹，你犯不着跟他费唾沫，我去！”

他们把我们二十六个人，带到县里关了八天，第九天放出来，由一个军官押着，叫我们赶着毛驴到乌鲁木齐去送麦子。喀什离乌鲁木齐有几千里，当中又隔着很多干旱的戈壁滩，不用说饿，就是渴也能把人活活的渴死，所以大家心里很难过，但是，有军官押着又不能不去。家属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都带着东西赶来送行。可是万恶的军官，不仅不

让她们送，而且连面都不准见。我媽只好远远地跟在我們后边，擦着眼泪走一程又一程，真是生离死别呀！到后来，那个軍官掏出枪威胁她们：“滚回去！滚回去！”我媽急的跌倒在地上，伸着两只手向我哭喊：“你可要想法回来呀！孩子！”我的心象刀戳一样，忍不住也呜咽起来。走去很远，还听见我媽在那儿哭喊……

我們从2月到11月，走了九个多月，受尽了千辛万苦，总算是到了烏魯木齐。誰知，那个被狼吃去心肝的軍官，竟然把粮食全部私吞了，拐带了一个女人，丢下我們就逃跑了。我們这些人，在烏魯木齐都是举目无亲，又到了十冬腊月，要吃沒有吃，要穿沒有穿，就这样流落在街头。有时找到短工就做做，沒有只好讨飯。以后，我在老滿城找到个打围墙的帮工活干，可是由于身上穿的单薄，虽然是干活，仍然冷的发抖。有一个汉族工友，看我还穿着单衣，就说：“老乡呵，眼看这天气越来越冷了，你这一身衣服可熬不过冬呵！”

我说：“在这儿沒亲沒故，有啥法子！”

“唉！那倒是。俗語说：穷在鬧市无人問，富在深山有远亲嘛！在这个世道上，穷苦人即便有亲戚也沒有用。”他停了一会又说：“哎！你到八道湾下煤窑去吧，在窑底下暖和一些。”我听从了他的话，到了八道湾一家小窑上，当了“吭七”（下煤窑的人）。从此，我就从地上的奴隶又变成了地下的奴隶。

在那年月，下煤窑当矿工，跟现在比可是天地之差。那些窑主，眼睛里看的只有嘩嘩响的大洋钱，我們工人在他們眼睛里，連一头牲口都不如。只要你挖煤，他是什么也不管，

更不用说什么劳保了。

我到了窑上，半夜里老板叫我把衣服扒光，给了我一块破毡垫围在腰里，又递给我一个油葫芦，叫我点着了下窑去背煤。我顺着绳梯爬下去一看，吓了我一身冷汗。这哪儿是人做活的地方，简直是个活地狱。几百米长的运输巷道黑洞洞，里面全是煤末子（那时老板只要块煤，不要煤末），到处坑坑洼洼，又低又窄又闷气。工作面只是一个几米的大黑洞，连一根窑柱也没支。背煤工都是赤条条地在腰里围着一块垫子，背上驮着个一百多斤的煤筐，一只手扶着筐，另一只手还得端着个油葫芦照亮，说爬不是爬，说走不是走，累的“吭哧吭哧”地喘气。就这样，后边还跟着个工头，拎着根棒子象赶驴一样“的啾的啾”地吆喝。

他们也给我装好了煤，放在背上，我这才明白大家为啥那样走。因为巷道太低，高了碰头，低了又要跌跤。在巷道里就是空着手走还感到很费劲，何况还背着煤筐？我喘着大气拚命跟上大家，到了井口倒掉煤，一摸腰背，由于煤渣串到垫子下面，再经煤一压，皮肉都已经轧烂了，粘糊糊摸了一把血，痛得我要命。老工人叹着气跟我说：“小伙子！你得悠着点劲干呐，时间还长着哩！”果真是那样，我肚子饿了几次，才熬到下工，可是上了井一看，已经又是满天的星星了。

我们吃过饭，我满以为这回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但没等睡上两个钟头，却又被工头叫起来，再给吃顿饭又下井。长了，我才明白，原来这是老板想出来的多干活省粮食的一个毒法。当初说的是一百二十筐煤一个定额，是计件工资，可是，谁也没有从窑上拿走过钱。平时，他不给你算账，到春天歇工的时候（春夏煤卖不出的时候，就停工），你让他给

你結賬拿錢，他却把眼珠子一翻，說：“你們挖的是煤，不是錢。要錢沒有，給你們一人合三十筐煤。”我的天，那時天氣已經暖了，道又泥濘，還有誰到這山溝子裏來買煤？這時，那狠毒的老板，看見大家發愁，就抄着手再嘿嘿地奸笑着湊過來，說：“我看你們也實在為難，這樣吧，你們把煤放在這兒，我給你們代賣；不然，就按半價合給我，嘿嘿，雖然我也困難，可總比你們肩膀要寬的多，担得住。”看他那一副奸猾樣子，把我們氣的肺痛，有時恨極了，干脆把煤堆起來，放一把火燒掉，然後就到農村去找零活做。可是，因為沒有錢，衣服單，到冬天還是得回來下窖，就象賣給那兒一樣。那時，在我們吭七裏面流傳着這樣一首歌：

烏魯木齊的窮人多半都在煤窖，
靴子和衣物都換成了當票，
整天呆在坑下想走也走不掉，
几枚銅板就象把我的命賣了。

這首歌說的一點也不假，只要你走進煤窖的門，就只有躺着（死掉）才能出去。一年之中事故無數，死傷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有一天，我們四個背煤工，剛走進一個工作面裏去裝煤，忽然轰隆一聲，頭頂上的石頭塌了下來。等烟塵散了，点上油葫蘆一看，兩個伙伴被埋在石頭裏，一個伙伴的腿被砸斷了。我們把那兩個伙伴扒出來時，他們的身子血肉模糊，腦袋已經碎了。大家難過的都掉了眼淚，可是老板來了，第一句話却問：“壓住多少工具？”我們氣的說：“你怎么不看看人？”結果他連一塊布都沒有給（維族是用布包尸），我們只好就那樣抬着把他們埋了。

那时候，我們一天干二十来个小时的活，吃的只有两頓高粱或者麸皮饅，住的是破泥巴屋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在湿地上鋪一点草就是床，一头垫点煤灰就算是枕头。就連这样的破房子，有了病不能上工时，还不許在里边住。有一年，我得了疟疾病，害的我瘦得皮包骨头，渾身軟的不能动。老板不仅不給我治，反而在我病垂危的时候，停了我的伙。工友們去质問：“他是給你干活的，你为什么不给飯？”老板把手一背，臉一扬，冷冷地说：“干活給，不干活就不給。”他不給我飯吃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披着人皮的狼，趁着工友們下井的机会，叫工头們硬把我从屋子里扔出去了，说：“你要死就死在外边吧！”

“我还没有死啊，我还没有死啊！”我喊，我叫，可是有誰来理会我呢？

工友們下工以后，在外面煤灰里发现了我，就把我搭在一个土窖里，每天上班的时候，給我放一土碗水，掰下半块饅。但是，我虛弱地連土碗也端不起；要解手只好慢慢地往外爬，暈过去，醒过来，醒过来再暈过去，当我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正是滿天星月。我伸出手看了看，只剩了一层薄皮几根骨头，不由的想起了我的家，想起在我临走时候媽媽喊的话。我难过地说：“媽媽！我再也回不去了！”

.....

万沒有想到，我这个受煤矿老板奴役了十四年的“吭七”，竟然熬到解放。旧社会把我变成奴隶，打入地獄；共产党、毛主席把我們从地獄里拯救出来，成了国家的主人。

解放后，我在烏魯木齐六道灣煤矿，当了一名放炮手。自从我到这个矿上，心里老挂着矿上的事。每天上班前，下

班后，我就爱到矿里各处转转，哪里没有拾掇好，就随手拾掇拾掇；哪里有漏下的工具，也就捎带着捡回来；哪里有扔掉的废药线，顺手拾起不让它废掉。我总是想，多为国家节省一点钱，在安全生产上能多起一点作用，这就是我的幸福。

（觉非 整理）

我真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倾吐

上海邮电器材厂机械工程师 蔡金龙

我今年五十四岁了，但我真正的生命，却是从新中国成立那时开始的。

抚今追昔，忆苦思甜，不禁热泪滚滚。我要倒出解放前四十年中在我心头积存的苦水；我要歌唱解放后十四年来党和毛主席给我的恩情。

苦 海

我生在上海浦东乡下。祖祖辈辈都是佃户，世世代代受地主欺压，家里没有一个识字的。当我还在娘肚里时，父亲就替我取了个响亮的名字——蔡金龙。到我八岁那年，父亲向地主借了十块银洋，让我进了一所私塾念书。哪知道，我念了一年私塾，没有学到什么，家里却愈过愈穷，三天两头揭不开锅，更还不起为我读书借的“阎王”债。没办法，父母亲只好让我退学，含着眼泪把我送到地主家去当放牛娃抵债；我母亲也只得离开家，到上海去帮佣。

这个地主是只“笑面虎”，没开口，先露着焦黄的门牙嘿嘿笑。一天，他把我叫去，脱口喊了我一声，顿时就收住了笑脸，竖起眉毛说：“穷八字，富贵名，啥个‘真龙’‘假

龙’？今后不許你叫这个名字。”听了他的话，我肺都气炸了，心想：“穷人連个好听的名字都不能随便取嗎？”接着他又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冬天牛吃的草料不够，你白天把牛放出去找草吃，晚上再喂料房里的干草。”说完，他就跑进房內吸大烟去了。

隆冬酷寒，滴水成冰，漫天的西北风卷着鹅毛雪。我裹着一身遮不住羞的烂单衣，出外放牛。北风吹在身上象刀割，光着的双脚生满了冻疮，踩在冰冻的雪地上，疼得象乱箭穿心。这样的痛苦生活真难熬啊！

快近年关了，地主整日在家吃魚吃肉；而我却还在外边喝西北风。我实在熬不住了，一天，偷偷地从牛棚里拿了些干草烤火，暖和一下身子。誰知这事被地主知道了，他象凶神恶煞般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跌倒在地上。狠毒的地主又用鞭子沒头沒脑地抽我，一面抽，一面罵：“小赤佬，你要死了！老子叫你这条‘金龙’变成一条‘毛虫’！”一頓毒打，把我的脑神经和耳鼓膜打坏了，我昏倒在地上。待我醒来后，地主便一脚把我踢出了黑漆大門。

我冒着风雪，噙着泪水，跌跌撞撞跑回家，却不料母亲也被人家解雇回来了。她看到我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把我抱到怀里，伤心地痛哭了一场。半夜里，我渾身象火烧一样，特别是被打坏了的耳鼓膜痛得象針扎，里面“嗡嗡”直响，痛得我在床上翻来滾去。由于无钱医治，我的伤越来越厉害，整天发高烧，昏迷不醒，差点送了命。后来，我的命虽保住了，但耳朵听力严重减弱。

地主的心肠真是狠，把我害成残废还不甘心，见我活了，又逼我再去替他放牛。我母亲不忍心让我再去受罪，向地主

磕头求情，说我已经残废，不能再去放牛了。地主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了两声说：“不回去，也可以；马上还清欠债，算清饭钱！”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心一横，把自己起早摸黑开出来的三亩多荒地给地主抵了那笔“阎王”债。地主夺了地，还幸灾乐祸地骂我父亲说：“蔡家祖宗缺德，生了个‘现世报’！”

1923年，我一家四口都病倒了。父亲染上了瘟疫，手臂上又生了一个大毒瘤，鲜血掺着脓水直往外涌，痛得日夜喊叫。因为没有钱医治，就这样病死了。

父亲死去不久，小弟弟又夭亡了，我的病也加剧，几次昏死过去。一次，我昏死过去以后，母亲以为我死了，一边哭着，一边用破席把我卷出去，准备把我埋葬在父亲的坟旁边。这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几乎被大水冲走。母亲赶紧把我抱起，一摸，发觉我还有一丝热气，又把我抱了回来。她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直到我苏醒过来。当我苏醒了以后，看见破屋中一支残烛，发出幽幽的微光，照着母亲惨白的脸。母亲见我苏醒过来了，惊喜若狂地把我抱得更紧，顿时，我瘦小的脸颊滴满了她的热泪。

这次我虽然又死里逃生，但是我的耳朵却聋了，什么也听不见；声带也坏了，不能说话。我就是这样被万恶的旧社会摧残成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狠 窟

乡下不能活命，母亲就求情送礼把我送到我舅父开的上海金森记五金厂里当学徒。那时，我才十三岁。

天下財主一樣狠。舅父並不因為我是他的親外甥而“另眼看待”；相反，利用我生理上的缺陷，百般地虐待我。記得我頭一次煮飯，不當心煮壞了，我舅母——老板娘怒氣沖沖地走過來，擰住我的耳朵，伸手就給我兩巴掌。打了不算，還不准我吃飯。我只好餓着肚皮去干活。又有一次，我看見朱阿菊老師傅用銅水鑄模子，就走攏去想學點技術。朱師傅心腸好，他作着樣子拿起一杯燒沸了的銅水，慢慢地倒進一只小模子內，一面倒一面吹氣。我也照樣倒，照樣吹氣。我恐怕氣力不夠，就使足了全身力氣吹，不料把倒下來了的銅水都吹在水門汀上。這件事又被老板娘發覺了。她用雙手使勁地擰着我的耳朵，然后又左右開弓打我。我立腳不穩，一頭撞在風箱上，差一點跌倒在燒沸了的銅水中。

我實在受不了這種虐待，就逃了出來，流浪在街頭。但是，我接連逃了三次，被老板抓回去三次，每次都被打得渾身鞭痕累累。逃跑不成，我只得在廠里繼續做牛做馬。我日夜勞累得不到休息，身體很虛弱。有一天，我从三樓提着一大銅壺開水下來，在下樓的時候，突然頭昏眼花，兩腳一軟，跌倒在水門汀地上，右腳背被開水燙得滿是血泡。狠心的老板娘不但不給我治療，反而把我鎖在鴿子籠似的小閣樓里受罪。三伏天，悶熱的“鴿子籠”里充滿了臭氣，臭蟲、蚊子叮得我全身紅腫，我的傷口也爛得出了蛆。幸亏朱阿菊老師傅偷偷地弄了一點豆油給我塗傷口，傷口才慢慢地好了。

我在廠里做了三年學徒，从朱師傅那里學到了一點技術，總想可以滿師了。誰知，老板要我拿出四十塊銀洋辦“滿師酒”，否則還要做三年學徒。天哪！我身無分文，哪有钱辦酒呢？結果，只得繼續當學徒。一個三年，又一個三年，一

直熬到了第九年，那时我已经有了一手熟练的技术，老板才让我满师。老板欺我是一个哑巴，给我的工资只有一般工人的三分之一。真是气人哪！我早就想离开这个“狼窟”，但苦于没有机会。后来，这个工厂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了，我才离开了这个“狼窟”。

地 獄

在旧社会，残废人到处受欺凌。我离开了金森記五金厂后，又先后到过四家工厂做工，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记得我在一家工厂做了半年工，结果没拿到半分工钱，气得我病了三个月。

1945年2月，我被騙子騙到日本鬼子办的一家軍火工厂做工。在那里，每天都有我們的同胞被日本鬼子无故毒打。我是一个哑巴，遭受的苦难，就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当时，日本鬼子为了防止我們工人反抗，就规定各車間工人不能相互走动。我不懂这个规矩，有一天无意走进了另一个車間，看见一个女工的头发被卷进机轮里去了，我急忙飞步向前，用左手拉机轮，救下了那位女工，但我的左手腕却被削去了一大块肉，当场就昏倒在血泊里。日本鬼子不但不給我治疗，反而誣说我是“密探”，把我抓起来拷問了一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这个工厂。我以为国民党是中国人，总会对中国工人好一些。其实，他們和日本人是一丘之貉。他們刚接收工厂不久，厂里一些工賊混水摸魚，大量窃卖厂內器材，以飽私囊。我当时耳朵听不见，也不知道他們干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别人拿东西，自己也拿了一小卷旧皮带做了一根褲腰带，结果被大門口卫兵查到

了。那些工賊就乘机嫁禍于我，誣賴我是“大盜竊犯”，把我毒打了一頓，硬逼着我这个哑巴招“口供”。我是个哑巴，有冤说不出。他們把我打得皮开肉綻以后，又把我关进了阴暗的监牢。我在牢里，渾身生滿了疥疮，还得了严重的胃病。后来我从牢里逃了出来，在外过着流浪的生活。

多少个凄风冷雨的夜晚，我随着苦难的人群，蹣跚在黃浦江畔。这时，母亲已病死在乡下，家里仅有的半間草棚也被土匪放火烧掉了。我望着江水，想到我悲苦的身世，什么时候才能結束这苦难的生活呢？

新 生

1949年，随着上海的解放，我也得到了新生。我这个在旧社会中受人歧視的哑巴，从此做了国家的主人。

在我工作的单位里（当时在交通部上海电訊局修配所工作，1952年調到上海邮电器材厂），領導上对我非常关心，处处照顾我，时时帮助我，使我能順利地克服了因生理缺陷而帶來的种种困难。就在1950年，我在厂領導和工人帮助下，創造了电报机內一个“梳齿梗”，提高了工效四十倍。

党的恩情似海深。我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身体很虛弱，党就送我到杭州去休养；党还千方百計为我治疗聋哑，1955年，我去北京开会，邮电部負責同志亲自把我送到医院去治疗。虽然医药不能再治好我的残疾，但这件事却永远銘記在我的心上！

1958年，这是我終生难忘的一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组织上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的时候，我激动得流出了幸福的眼泪。我，一个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和歧視

的哑巴，也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怎能不叫我激动、高兴啊！

那一年，厂里掀起了技术革新热潮。为了使电传机能成倍地增产，我们尝试制造一副复杂的“压铸模”。过去，这种模子是经过泥坯翻砂后制成的，工效低、质量差；这次要求造出的一副模具，直接用金属溶液浇铸，在新中国邮电事业中还是第一次。厂领导经过研究后，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

在党组织和工人同志的鼓励下，我毅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制造过程中，党给了我无限的力量，使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比如看图纸吧，以前我制造的模具，都是凭几十年积累的经验，靠打“腹样”而制作的。这次试制“压铸模”的图纸，有一百五十多张，而且相当复杂，我都不熟悉。于是，我下苦功，揣摩每一张图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每张都记住了，然后在脑中拼成一个假设制成了的模具。就这样，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终于把“压铸模”造成了，生产工效提高了二百八十倍，产品质量也显著提高。

十四年来，我在党的教导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在邮电器材的革新方面，每年都做出了一些成绩，还创造了十四年不出废品的纪录，同时，也帮助旁的同志挽救了不少将要报废的成品。党对我做出的每一点成绩，都非常重视，还给我荣誉和奖励，数次评我为先进生产者；让我三次上北京；1960年，党又提拔我当了工程师。这些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1961年“五一”节，我和全市二百九十多位先进生产者，在上海电机厂会见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时，我



真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倾吐，但我说不出来。我只能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我对毛主席深深的敬意，来表达我内心所要说的话：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解放了我，使我摆脱了旧社会的折磨和摧残，过着幸福的生活；是您培养了我，使我这个受尽凌辱和欺压的哑巴成为新中国的工程师。这海一样深的恩情，我怎样来报答啊！

我感到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和奖励太多了，而我给党和人民所做的事却太小太少。今后，我要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人残废，心不残废，一颗红心永远向着党！”这就是我的誓言。

（王光汇 整理）

虎口夺生

印刷工人 朱炳章

我出生在东北长春，刚记事的时候，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那时，我家有六口人，除了父母和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祖母。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职员，我们一家老小，都靠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日本强盗的铁蹄踏进了长春，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记得，那正是个漆黑的夜晚，日本强盗不住劲地往我们的居住区打炮，房屋塌了，东西烧了，整个居民区变成了一片火海。我们虽然逃出来了，可是年老的祖母，由于手脚不灵便，没跑出院子，就被大火活活烧死了。

从长春出来，随着逃难的人流，我们先到了营口。在营口，因为没吃没住，一家五口都得了病。没几天，我一岁的小妹妹就死在我母亲怀里了。到哪里逃命？到处兵慌马乱，哪里都去不得。后来，父亲想起天津有一个亲戚，就决定到天津投靠亲戚。没有钱，还是走不了。最后，父亲含着眼泪，把我三岁的大妹妹卖给人，才买了两张船票，从营口到了天津。在天津，没有找见亲戚，又来到北京。父亲说，北京有一个朋友，托朋友找到了事做，我们就可以不挨饿了。父亲把我和母亲安顿在广安门附近一个小客店里，第二天，一清

早就出去了。可是，这一去再无音信——朋友没找到，半路上父亲饿死了。

父亲死了，丢下我们母子，更没了活路。那时，我还不满八岁，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只能天天上街拣煤核，拣破烂。母亲是个善良的人，眼泪哭干了，眼窝哭烂了，她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为了把我拉扯大，她整天整夜地给人家缝衣补袜，两只手一会儿也不闲。后来，伪财政部印刷局有个叫朱其谦的老工人，妻子死了，丢下两个孩子没人照管，经人说合，母亲就带着我，嫁给了这个老工人。从此，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地。

九岁徒工挨打罵 烙铁烙我娘心痛

来到继父家里，虽然有了落脚的地方，但是人多收入少，肚子还是填不饱。为了找饭吃，来北京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刚满九岁那年，就到宣武门外一个成衣铺里当学徒。

当学徒，可不象现在这样舒服。那时当学徒，首先要订一个合同，合同上明文写着，资本家和师傅都可以随便打骂，就是打死也不犯法。要指望学点手艺，首先得把命豁出来。

我第一次学徒，是母亲亲自送我去的。那天，早晨起来，母亲叫我洗净手脸，给我换上刚洗过的旧衣裳，提上一个小行李卷就去了。一路上，母亲一边落泪，一边嘱咐我。她说：“孩子，你两个妹妹死的死卖的卖，娘就你这么个亲骨肉了，到了铺子里，要听人家的话，好好地学手艺！”母亲说一句，我答应一句，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宣武门外那家成衣铺里。

母亲走了，我站在那里，怯生生地望着资本家的脸，哭

也不敢哭，动也不敢动。

“扫地去！”一个狼叫似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资本家扔过一把大条帚。我扫了屋子扫院子，扫了厨房扫厕所。从此，我就给资本家当了小奴隶。每天，除了扫地，就是端茶倒水抱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到工作台前看一看。

这样干了半年，好不容易才盼到叫我拿针钉纽扣。我拿起针一扎，手上尽出汗。资本家一看我不能拿针，就大发“慈悲”给我治手。怎么治呢？他叫人沏了一大盆滚烫的碱水，硬叫我把手伸进去烫。九岁的孩子，肉皮还嫩得很，手往碱水里一伸，就痛得我钻心。我把手缩回一看，又红又肿，变成了两个红馒头。第二天，肿得连窝头也捧不住了，资本家还是强迫我烫，我不愿烫，资本家就用木尺打我的头，把我打急了，我就跟他顶嘴说：“我就是不烫，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怎么着？我用烙铁烫你狗日的！”资本家一边骂，一边凶狠地抄起烙铁就往我脸上烙，哧溜！哧溜！一连烙了我五烙铁。我痛得死去活来，就大骂资本家。资本家听我骂他，更凶了。那正是个夏天，我只穿条短裤，他握着烙铁，哧溜！哧溜！烙了我的肚子又烙我的脊背，一连烙了我二十烙铁。当时，我痛得就不能动了。晚上，资本家连饭也没给我吃。我怕他再烫我，半夜装作出门解手，忍痛跑回家里。

回到家，母亲点着灯，把我拉到怀里一看，青一块，紫一块，浑身上下都烫焦了。我哭了，母亲也哭了，她心痛地拉着我的手，半夜没有合眼。

我在这个成衣铺当了半年小奴隶，所得到的，就是这一

身烫伤！

“慈善”机关不慈善 “救济院”是座监狱

我从成衣铺逃出来，又进了国民党“慈善”机关在西直门举办的“救济院”。没进去以前，听人说，“救济院”是国家办的，管吃管穿，不挨打不挨骂，还能念书、学手艺。我一听，可高兴啦。我想，这回可找到了个好地方。

没有想到，“救济院”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口！也是一座小监狱！

那天，我被人带进去一看，全是破衣烂衫的穷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七、八岁。他们见我这个新伙伴一来，就跑到我跟前，围住了我。他们告诉我，监工的天天叫他们织布、织袜子，却不给饱饭吃，一顿就给一个小窝头和半碗菜汤，天天还挨打挨骂。我一听，头发就发直。功夫不大，我被监工的领进了织布间，里边装满了破旧的织布机，在那里操作的，都是瘦骨嶙嶙的小孩子。开始，监工的叫我往木梭上绕线，以后，就叫我登机子织布，动作稍微慢点，监工的过来就给我两个耳光！许多孩子经不住饥饿、劳累和毒打，病倒了，死去了。我进“救济院”两个月，也被折磨得不象人样了。

“救济院”就是监狱，凡是进去的孩子，很少有活着出去的。我天天在织布间绕线、织布，天天挨打受气，哭也不敢哭，说也不敢说，天天盼着母亲能接我出去。

过了三个月，母亲来看我。可是，监工的不让我出门，也不让母亲进门。隔着一道大墙，我在里，母亲在外。母亲从一个小窗口看见我头发老长，满脸油泥，又黄又瘦，连站

都站不穩，她心痛得又哭了半天。

母親怕我死在“救濟院”，到處求情托友，打聽到宣武門內有個“四合興”藤椅鋪，那里正缺個徒工，就把我接出來，送到了那里。

棍子下面當奴隸 菜刀下面奪生命

“四合興”藤椅鋪的資本家，長相特別凶，他肥頭大耳，我一看見就害怕。他還有個老婆，一臉橫肉，打扮得妖里妖氣，工人們暗地里都管她叫“母老虎”。我邁進藤椅鋪的門坎，給資本家和“母老虎”磕過頭之後，資本家說：“你要聽我的話，不聽，這條棍子不答應！”

那年，我還不滿十一歲，除了掃地、倒水、端尿盆，還要做二十幾個人的飯。不合誰的胃口，誰就伸手打我。在那里學了一年徒，做了一年飯，挨了一年打。我被打傻了，打糊塗了，見了誰都害怕。

最叫人氣憤的，是給“母老虎”做壽。那天，資本家請來了很多少爺小姐，在樓上大擺酒席。他們吃完了，喝足了，便叫我去洗盤洗碗。我又困又餓，四肢無力，樓梯又滑，一不小心，連人帶碗從樓上滾了下來。我的胳膊被摔斷了，痛得我爬不起來。資本家不僅不管我摔斷了的胳膊，反而怪我摔碎了他的盤碗。他抄起棍子朝我劈頭蓋臉地打來。一陣毒打，把我打得死了過去，又把我拖到牆角的泔水桶旁，資本家上樓喝茶去了。當時，有兩個工友看見我被打死過去了，趕緊給我往嘴里灌水，又用冷水噴我的頭，當我剛剛被工友們救醒後，睜開了眼睛，又被“母老虎”看見了，她抄起一根棍子又朝我一陣毒打。我氣憤極了，咬緊牙關，爬起來就



用头照着她的肚子撞过去。我猛一撞，她往后一倒，扑通一声，坐进了泔水桶里。这时，资本家闻声跑下楼，抓起一把菜刀就朝我砍来，幸被两个工友上前一挡，才没有砍中我的脑袋。我看大势不好，急忙逃出门外，用尽力气，穿过大街，穿过胡同，逃脱了。

端阳被抓押包头 滚油锅里受熬煎

我十二岁那年，又到崇文门外“天一成”铜铺当学徒。那个铺子是专门做烟锅和茶盘的。我在那里学了四年，学会了一些手艺。满以为有了点手艺，可以混饭吃了，没料到，又被日本兵抓去当了劳工。

那天，正是端午节，我請假回家看母亲，刚走到天桥，就见日本兵到处抓人。我沒来得及躲閃，就被架上汽車，拉到了前門車站。日本兵象运牲口似的把我們关进悶罐子車里，走了三天三夜，押到了西包头。打开車門一看，到处都是被抓来的中国人。他們强迫我們修铁路，怕我們逃跑，四周围都安上了炮楼和电网。

做苦工酷似下油鍋。日本鬼子不給吃的，每天只叫喝两碗粗糠粥，大便下来狗都不吃，风一吹就吹散了。身上沒有力气，还得抬上二百斤的大筐来回跑，走得稍慢一点，日本鬼子就用皮鞭抽人。我亲眼看见，很多人跑着跑着沒了力气，往地上一栽就累死了。人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設法往外跑，可是，沒有一个跑脫的，不是被电网电死，就是被日本兵用枪打死，或者被狼狗咬死。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一个小伙子，想家想的厉害，刚刚放下鐮头往外跑，就被监工的掄起鎚头砸破了脑袋，那青年脑浆外流，当场身死。最可恨的是，日本鬼子拿中国劳工当“靶子”打，中国劳工正抬着土筐在路上走，他們站在崗楼上就向中国劳工瞄准，一枪一个，死在他們手里的中国劳工不知道有多少。

我們活着的人，是怎样逃出来的？那是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八路軍突然向西包头的軍事倉庫袭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之下，炮楼被炸毀了，电网被切断了，我們这三百多名中国劳工，才九死一生地逃出了活命。

逃出来后，要坐火車沒有钱，想順着铁路线往北京走，又怕被日本鬼子抓住。于是，我們仨一群，俩一伙，专门繞着山路走。当时我們都沒有穿着棉衣，一人身上披一块老羊皮，一路走一路讨飯。遇上小房破院里的穷兄弟，他們宁可

自己少吃一口，也愿意给我们一点。如果遇上高门大院的地主，不仅不给你饭吃，还要放出恶狗咬人。当时，我屁股上就被地主的狗咬下了三块肉，鲜血顺着裤子往下流，至今伤疤还留在身上。

就这样，我们踏着冰雪，走了一个半月，终于又走回了北京。

煤窑里刚刚爬出 又一下掉进苦海

回到北京，继父的一个朋友在唐山做事，他来信说，日本人正在唐山的唐庄子煤矿招矿工，如果愿意去，可以下煤窑挖煤。为了饭碗，我离开北京，独自去了。

这个矿的矿长是个被日本雇佣的美国人。他只知道从工人身上榨取血汗，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矿井里，连最起码的防护设备都没有。工人们下井，随时都有被水淹死、被石头砸死和被瓦斯炸死的危险。为了饭碗，明知危险，我还是下去了。

当我下井的第八个月头上，却差点丢掉性命。那天，我和三十多个矿工正在井下装煤，忽听轰隆一声，顶子塌了下来，我们三十多人，一下子被埋在了下面。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更主要的是没有空气，我们差不多都快要闷死了。井外的矿工一听说我们被埋在下面，纷纷要求矿长下令挖掘。那矿长却恶狠狠地把眼一斜说：“挖他们干什么？两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工人们悲愤交集，和矿长展开了激烈斗争。矿长不下令，工人们就自动组织起来，动手挖了两天一夜，才把我们挖了出来。可是当场就有二十多个难友死去了。剩下我们十个人，经过工人弟兄的抢救，才

又还过气来。

我想前想后，越觉得不能再在这个鬼地方呆下去。我想，死在外边，还有一把骨头，死在井下，连骨头也找不见，我那可怜的母亲知道了，该为我多么伤心呀！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把仅有的几件旧衣裳和被褥卖了，买了一张火车票到了天津。

在天津，到处见到失业的人群，没有办法，我又流浪到塘沽码头，当了搬运工人，整天扛着二百多斤的大包装轮船。那时，我刚从床上爬起不久，身子很虚弱，再加上不会走跳板，身子一晃，扑通一声，连人带包掉进了大海。我不会凫水，一掉进去就淹了个半死，幸亏穷兄弟们把我又救了出来。我上了岸，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把头就举起棍子打我，把我赶出了塘沽。

潮河边三天三夜 差一点被狼吃掉

生活逼得我实在没法了，我回到北京后，就向人借了一点钱，买了几十斤盐到张家口做买卖，心想快挣几个钱，回京买粮吃。没想到，又被日本鬼子全部没收了。

没了盐，没了钱，回不了北京，我就住在一个小客店里。那时，传染病很多，我也得了伤寒病，在小客店里一躺下就起不来了。过了十几天，我交不出饭钱，掌柜的就断了我的饭。掌柜的看看我黄瘦的样子，说：“这个人不行了，多住一天多一天麻烦，把他拖出去喂狗吧！”于是，我被拖到了张家口市南大清河的河滩里。当时，我虽然动弹不了，可是，耳不聋，眼不瞎，什么事心里都明白。我独自在那里躺了三天三夜，没人理也没人管。天天晚上看见野狼三五成群地吼

叫着从我身边窜过去。我望着满天的星星，想起了死去的祖母和妹妹，想起了死去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我流泪了。我想喊，喊不出声，我想爬，爬不起来，我就等着死啦。

那是个大夏天，我在河滩上躺到第四天中午，突然有一个人来河里洗澡。他站在我跟前端详了半天，惊讶地说：

“你躺在这里干什么？”

“啊？你是谁？”我又惊又喜地问他。

他说：“我也是北京的，在牛街住，咱们见过面。”

噢，我想起来了，他也是北京的失业工人，不久前才跑到张家口做小工。于是，我用微弱的声音向他述说了自己的遭遇。最后，我恳求他说：

“好大哥，你如果回到北京，请你千万到我家一次，告诉我的母亲说，我已经死了，不能照管她老人家了，叫她好好保重，不要为我操心了。”

天下穷人是一家，受苦人总是向着受苦人。他听了我的述说，关切地说：

“老弟，不要这样，咱们都是穷哥儿们，我可不能扔下你不管。”接着，又亲切地问我：“你想吃点什么？”

当时，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可能再活下去了，还吃东西干什么？可是，心里热得如火烤，嘴里干得象冒烟，我口渴得厉害，就顺便说：“我想吃点冰。”

“好办，你等着。”说完，他从市区给我买了一块冰，一点一点地喂进我嘴里。说起来，真是奇迹，我吃下了冰块，身上竟然发起汗来。发过汗之后，身上立时就觉得轻松了一些。那位半相识的北京工人，见我病势轻了，又给我买了些煎饼，我吃了一些，身上就有劲了，病情更轻了。我又躺了

半个月，健康情况逐渐恢复了，又开始为生活而到处流浪、奔走……

饿断肠走头无路 瞞老母自卖自身

既然沒有死掉，就得設法活着。听说日本鬼子在天桥招华工，一个壮劳动力可以卖一百元。我就瞞着母亲，偷偷地跑到天桥，给自己插上标签，把自己卖了。本想，卖一百元叫母亲买粮食吃，沒想到又遇上个騙子，一毛钱沒拿到，就被押到門头沟下了煤窑。

門头沟煤矿和唐山煤矿一样苦，在井下干了不到一个月，差点儿又被砸死，我又脫身逃了出来。

逃出来，还是沒有飯吃，我又自己把自己卖了三次，又設法逃脫了三次。最后，我被押送到大同口泉煤矿下煤窑，日本兵看守得特別严，我再也逃不出来。

我忍着屈辱干了五个多月。

和我在一起干活的，是五个比我小几岁的北京孩子。他們和我一样，沒有办法，才自己把自己卖掉，来口泉煤矿受苦受罪。有一天，我們正推着煤車，在井下吃力地走，突然車翻了，一个小兄弟的腿被軋断了。那天正下着大雪，我背着他爬出来，踏着冰雪走了六里地，来到一个日本医院里。日本人一看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华工，連站也沒让站，就把我們推了出来。我只好背着这个小兄弟往回返。半路上，这个小兄弟就在我背上痛死了。我含着眼泪，把他安放在一个土坑里，捧了几捧雪盖上，算是把他安葬了。

眼看着无数华工被日本鬼子折磨死了，我們有怨无处伸，有苦无处訴，有仇无处报。我想，在那里反正都是个死，何

不豁出命来往外跑？当天夜里，我和那四个小兄弟一商量，都同意马上行动。于是趁敌人稍不注意，我就领着他们跑了出来。刚跑到口泉沟的沟口上，一个巡逻的日本兵发现了我们。没等他扣响枪机，我们五个人向前一扑，把他按倒在地上，下了他的枪，又把他用绳子捆起来，扔到一边，然后继续往前跑。

跑呀，跑呀，刚跑到大同西边的大桥上，一群日本兵就追了上来，枪声和马蹄声在背后响成了一片。眼看就被追上了，我一纵身就从桥上跳了下去。接着，那四个小兄弟也都跳了下去。当时，天气很黑，河里还没冻实，我们一人抱住一个冰块游出好几里地，才算没有被日本鬼子抓住。

当天夜里，又冒着生命危险跳上运煤的火车，经过长途奔波，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为饭碗日夜奔走 拉洋车跑遍北京

经过多次求情送礼，我进了伪财政部印刷局，和继父一起当印刷工人。那是个现代化的大工厂，对工人的剥削也更厉害。我们父子俩累死累活地劳动，所挣的工资还是养不活一家五口。我们只好改做长年夜班，夜里进厂做工，白天上街拉洋车。

我们熬着，盼着，希望有一个出头之日。盼呀，盼呀，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来接收了工厂。可是，那些从天上飞来的“劫收大员”们，只知道往自己怀里摸钱，工人的死活根本不问不闻。1946年3月，竟然大批开除工人，许多人被一脚踢出厂外。当时，我的继父也被踢出厂外，丢掉了饭碗。

本来，我們父子俩在厂里做工还維持不住最起碼的生活。继父失业后，生活就更难維持了。沒有別的办法，只能在下班后更多的上街拉洋車。我拼命地拉着跑着，汗珠洒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还是填不飽肚子。

拉洋車，还常常遇上更倒楣的事。有一次，我在东单牌楼等乘客，突然过来一个美国兵，喝得醉醺醺的，硬要我送他到东交民巷美国兵营去。那时候，国民党丧权辱国，认贼作父，把美国佬当成了亲爹，誰敢说不拉！那野兽一上車，就催我：“快跑！快跑！”我跑不动，他就用皮鞋踢我。我的力气用尽了，汗水从头顶流到脚跟，好不容易把他拉到了兵营門口，他却不給車钱。我不向他要还好，我一向他要，他竟然破口大罵，一脚踢断了我的車把。我要拉他去讲理，他更怒了，伸手就打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滿嘴出血。我恨，我气，却沒有地方讲理。

虎口夺生有今日 永远記住当年苦

1949年，北京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这个从虎口里逃出来的人，才永远地結束了那悲慘的生活。

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十四年来，我的阶级觉悟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1953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1955年，党又提拔我为工段长和技术員，最近又担任了不脫产的党支部书记。我常常对自己、对孩子和車間里的青年工人們说：我在旧社会受的苦，是很多老工人都受过的苦，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苦，民族的苦。今天，我們生活在“蜜罐”里，决不能忘記过去的血泪史！

（李学鰲 整理）

在帝国主义开办的厂子里

郑州烟厂彩印車間老工人 姚福海

在旧社会，我們工人中流传着一句话：“工人好比板凳头上放鸡蛋，一不小心就有摔烂的危险。”

十四年前，我在武汉印刷厂作工。这个厂是英帝国主义开办的，在这里作工的工人，都飽受过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和剝削。从进厂、上班到走出厂門，规定了各种条规，它象毒蛇一样，紧紧地纏在工人身上，稍有“不规”之事，就馬上开除。

先说进厂。那时，工人要想进这个厂可不容易，得人上托人，保上加保。我十八岁进这个厂时，找了三个“鋪保”，才算进来了。进到这个厂，就象进到鬼門关一样，阴森森的铁門，整天关得死死的，只在每天早上七点上班前十五分钟才开門。我們工人为了赶上这短暫的开門時間，不管是酷暑严寒，刮风下雨，每天清晨四点就得在門外等候。我家当时住在桥口烟厂附近，离印刷厂足有十五里地，为了混碗飯吃，每天是三、四点就得起床，带着干粮，赶往厂門口。一开門，拥挤在門外的几百个工人，蜂拥而进，誰也怕自己被关在門外边。

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剝削压榨工人的血汗，在工房里还設

了一座特制的大洋钟，凡是上班的工人，都得拿着自己的名牌，在这个钟表里打一下牌子，记下上班的詳細時間，几点几分进工房，迟到一分钟就要扣一个钟头的工钱，連續迟到三次就要开除。我們切裁小组一个外号叫“小胖”的青年工人，他有一次只迟到了一分钟，扣钱不说，洋人工头还借故他调皮，把他开除了。现在这个钟还在我們車間挂着（武汉印刷厂并入郑州烟厂）。它是帝国主义剝削压迫我們工人的罪证，一看到这个大洋钟，就忘不了帝国主义压榨中国工人的罪恶勾当。

在上班時間，帝国主义分子統治的更厉害。工人除了有為他們卖力干活的自由以外，什么自由都沒有，就連大小便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每个小组只有一个到两个“解手牌”，拿不到牌子是不能去拉屎撒尿的。我們小组六七十个工人，只有两个牌子，一个上午能轮几个人？更可恨的是，洋人工头有时还要亲自跑到廁所去抽查，要是看见你在说话，就馬上以违犯“厂規”的罪名把你开除。一次，有个工人解罢手和别人说了几句话，被洋人工头“抽查”住了。随后这个工人被开除了。他們还有一条“規定”，上班時間不准工人乱串乱动，而他們象吃人的老虎一样，在工房来回转动，瞪着两只賊眼，盯視着每一个工人，誰要稍动一动，就会遭殃受难。有一次，一个叫李明海的工人，在班上因为鞋子掉了，弯下腰提鞋，被洋人工头弗兰克看见了，说他在玩，李明海心不服，站起来和他爭辯，这一下激怒了洋人工头，他恶狠狠地吹着口哨，摆着手指头，意思是叫李明海去见洋人大板（相当厂长）。这个大板更混蛋，他只听工头的话，那管工人申辯。就这样李明海也被开除了。小伙子也够剛强的，他



在洋人面前毫不示弱，回到工房，看到洋人工头，恨之入骨：“老子不吃你的飯，就不怕你！”順手拿起旁边的铁痰盂，照直往洋人身上扔去，只听“嘭”一声，痰盂落在写字台上，洋人怒气冲冲地跑上前要打李明海，这时站在旁边的工人齐吼一声，把洋人工头吓的夹着尾巴跑上了楼。工人们知道，这一吼会闖下大祸的，可是誰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怒火。沒多一会，从楼上跑下来几个带枪的家伙，把刚才吼叫帮腔的十几个工人都叫上楼去。这是洋人工头向大板抛斯勒克奏的本。大板当面訓斥了他們一頓，末了二话沒说，把李明海和这十几个工人統統給开除了。

下了班，按说总該轻松了吧，实际上人們心情更加沉重。一下班，工人匆忙地跑出工房，到厂門口排队听候“搜身”，所有的工人都得一字儿排开，窄狭的栏杆两边站着武装爪牙，一个个工人都得脫掉帽子和鞋子，两手平举，从头到脚被搜查一遍。如果搜出一顆釘子，或者一张废烟盒（印坏的紙烟装璜），就算违犯“厂規”，不是毒打，就是开除。我的哥哥姚福林，因为腰袋里装了几张作手紙用的废烟盒，搜查出来后，成了天大的“罪过”，馬上被开除了，連干了半月多的工钱也不給。象我哥哥这样的遭遇，一个月总要有几起。工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都气得咬牙切齿，但还是得忍耐着。有些年轻人可能会说：“何苦在这遭罪呢，干脆不干！”那时节，工人最担心的是“飯碗”，一个人还不当紧，有的工人都是携家带口的，一人失业，全家遭殃！不在这干，那也一样。

这就是我們工人，在旧社会，在帝国主义統治下遭受的苦难。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天渊之別。现在工人老了

有劳动保险，退休以后，有养老金，你可以安心愉快地度过晚年。我们车间去年就有几个老伙伴退休了。厂里还举行了欢送会，派人一直送到家里，一切安置得妥贴才回来，这能和过去相比吗？可是，现在有些青年工人，没有在旧社会受过苦，工作中挑肥拣瘦。叫我说，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

（华峯 整理）

九 死 一 生

桂林市建筑公司木材加工厂 王全祿

我没有童年的欢乐，只有充满泪水的回忆，因为我是从苦水里泡大的，过去的身世也不知从那时说起好，这里只谈谈自己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

我出生在湖南祁东县乡下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十四岁那年，父亲给地主帮工累死了。刚刚下葬，地主就把我们一家赶出家门，说我父亲在世时，欠过他家一担谷子，三年以后，一担滚成了六担，要拿我家的房子去抵债。我们母子三人被迫搬到一座粪房里住。这天晚上，母亲泣不成声地对我们兄弟俩说：“儿呀！家里没田没地，连个种田的锄头都没有，要活命只有自己找出路了。”于是，决定叫八岁的弟弟到一个富农家去放牛；我呢？母亲拜托了一位亲属，介绍到一个木作店做学徒，她老人家自己去讨饭。

这家木作店的老板徐景远，是个以待人刻薄、吝啬、凶狠闻名的家伙。他的店被称为“阎王”店，哪个学徒能顶得过三年出师，就算是命大的。

入店的这一天，保人带着我向老板叩过头，拜过师，然后向我宣读合同，叫我画押，这哪是师徒合同呵！比卖身契都厉害，上面第一条是“三年之中只管吃饭，不管其它。”

接着是：“中途逃跑，要保人負責償還飯費。学徒在三年之中病、伤、死与本店概不相关，学徒违犯店规，被打伤、打死，店主无責……”我听了以后，汗毛都竖起来了，但为了謀生吃飯，也只好咬紧牙齿在合同上画押。刚画过押，老板娘就把我叫进后屋，从牆上抽下一根竹鞭，在我的眼前直摇晃，吼道：“小家伙听着！家有家法，店有店规，要想少吃些鞭子，就少讲话多做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給什么吃什么，手脚要干净，否則，当心你皮肉开花！”

我哪是学徒呵！分明是个不花钱找来的小佣人。每天，从早到晚，手脚不停地干，挑水、洗衣、洗碗筷，天天都要忙到半夜才能睡觉。就这样，徐景远还觉得吃了亏，常说我吃得多、做得少。老板一家吃的是魚肉白米飯，我只吃些剩菜湯。每当吃飯的时候，那个恶老板娘总常在旁边守着，監視我吃飯不得超过限量；吃完第三碗，还想吃第四碗时，她就喝道：“你想胀死呀！”说着便盖住了飯鍋：“要再吃，就添猪食給你。”我常常一边吃着飯，一边吞着泪水。

老板的几个儿子都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和他娘老子一样恶。如果他叫你添飯，来晚了，或是动作慢了一点，他就用筷子在你头上一頓乱敲。有一次，我端粥給那个大仔吃，大概是燙了一点，他把一碗热粥泼在我臉上，痛得我滿地打滾。徐景远还跑过来給儿子做帮手，拿着竹鞭子朝我没头沒脸地乱抽；老板娘还在旁边罵道：“你想装死呀！要是真的死了，我就拿个破席子把你卷起来，丢到山上去喂野狗。”

我总算是一个苦接一个苦地頂过了三年，幸好沒給这个“閻王”店折磨死。到了第四年，我已经是個十八岁的小伙子了，有时店里的活路忙，也能插手进来打打杂，可是手艺

到底不行，因为我一直做伺候老板一家的佣人，从来沒有摸过木工活。但是，滿了师，老板得多少給我一点工钱。提起工钱，那真少得可怜！一年才給一百斤谷子。

我也就这样倒霉，还没有做到年底拿工钱，就生了病，在一个閣楼上躺了十天，沒有誰来照顾我，只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傅每天端几碗粥給我吃。这天，我发热发得迷迷糊糊，要水沒水喝，站又站不起来。只听到門一响，老板和他的老婆进来了。我的口又苦又干，全身好似給铁鏈紧紧鎖住、連翻身都翻不得，听到有人进来，象是遇到救星一样高兴。我哀求徐景远拿杯水給我喝，老板娘在旁边插嘴了：“你倒会享福，要老板給你倒水，我看还是請个人来伺候你好……”徐景远接着搭腔：“王全祿，我店里是不养閑人的，如果你要享清福，再躺下去，得付房租，給我飯钱了。”我恳求老板請个郎中，抓点草药，先治一下病，钱在年底发工資时扣，不料，那心比狠狠的徐景远反口说：“你还有什么工資？白吃了这么久的飯，一百斤谷子也扣得差不多了。”

徐景远和他老婆走出門外，一陣窃窃私語，我只听到一句——徐景远老婆说：“我可沒有钱給他买草席送葬，趁还有口气丢到外面去……”过了一阵，徐景远带了两个人进来抬我，说是給我安頓个好地方住。这时，我神智还清楚，知道事情不对，我乞求道：“老板呵！我还没有死，以后病好了还能給你干活，我已经給你干了四年活，看在这个份上吧！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小弟弟，我不能现在就死呵！”徐景远連理都不理，喊了一声：“抬出去！”两个家伙就七手八脚地把我卷着夹走，丢在后山的一个小庙里，庙里有个和尚給我几把禾草，垫在身下。这时，我的神智已经完全不清了，大小



便都动不了，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有什么在轰鸣，脑袋象是就要爆炸了似的，胸里闷得透不过气来，用力地乱撕衣裳，想翻过身，猛力地挣扎了一会，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一会，好象身子轻飘飘地升入天空，突然一阵凉爽的清风把我吹醒。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一看，自己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地方呵！群星就在我的头顶闪烁，四面是秋蝉声，远处还传来了鸡鸣……

我觉得病已经好了一些，慢慢地起来看看，原来我躺在山脚的一棵松树下，四周是静静的旷野。阵阵的秋风吹来，觉得身上有点发冷，口里又发干。后来我才知道，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两夜，那庙里的和尚嫌我大小便臭，影响香客，看我快要死了，就把我背出来扔在这地方。

我慢慢地爬起来，走到街上，敲开了一家邻舍的门，这里住着一位好心、孤苦的老奶奶，她平时待我很好，可怜我，体贴我。一开门见是我，吓得马上跪倒：“全禄呵！你活着

时，我待你不错，你为什么来找我？”我知道她老人已经把我当成鬼了，忙说：“老奶奶，我没有死掉，我是人。”她听了这两句话后，才慢慢站起来，仔细地端详过我后，就抱着我痛哭。我把自己复生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她。

在老奶奶家住了两夜，我觉得自己可以起来走了，要找个新地方去谋求生路，向老奶奶要了一个破篮子，一根打狗棒做为讨食的工具。从这时起，我开始了流浪生活……

（柳之琪 整理）

搬运工人的血泪

天津市汽車運輸三场 “六号門”老工人 赵恩祿

我家三代当搬运工人，卖苦力，祖祖辈辈受封建把头的折磨。

姐姐被折磨死了

在我小的时候，爸和哥哥一起拉排子車，可就是养不活全家。为了貼补家用，二姐七岁就去拣煤核了，八岁又当童工，記得二姐天不亮就走了，有时，天黑还回不来。我們問她干嘛去啦？她说：砸杏核、拣桃仁！常听媽咒罵：孩子頂着星星，披着月亮，一天就給一斤棒子面，还动不动就挨棍子。冬天，见姐姐只穿一件“羊油子”棉袄，冻得直哆嗦，手指头紅得象个葫蘿萹，我們弟妹拉她別出去，她看媽脸上难过的样子，就又走了。我长大点了，才知道二姐不去，我們就要餓肚子。为了养活我們，二姐忍受着各种折磨，经常餓着肚子干活。因此，二姐发育很不健全。她长到十五岁，高矮还象十岁的小孩子，并且得了心疼病和关节炎，瘦得皮包着骨头。二姐十五岁那年，病重了，起床都費劲，从家里到工厂只有几站路，她却要走上两个钟头。就是这样，她看弟妹都小，爸和哥哥一天拉不上多少活，賺的不够吃，还是

堅持去賺那一斤棒子面。可把頭不饒她，見她手脚慢，就不要她了。二姐沒活兒干了，一下病倒在炕上起不來啦，渾身疼，又哭又叫，家里干瞪眼買不起一副藥給她吃。不多日子，全家含着眼淚，看她咽了最後一口氣。家里更沒錢給她買棺材，想領一領破席把她埋了，可爸媽覺得她受了一輩子苦，心里不忍，就把門板拆下，釘了個木匣子。

哥哥又被折磨死了

二姐離開了我們，家里的生活更困難了，爸和哥哥的担子更重了。那時候，市面蕭條，活少人多，拉上一趟活可難啦。記得是1931年，天氣悶熱，我哥聽說“六號門”活多，趕緊拉車去攬活。誰知到了那里，活已經沒有了。過了一陣，又聽說馬家口有貨運，馬上又把車拉到那里，活兒又被人拉完了。上半天，我哥哥拉不上活，掙不到錢，肚子餓的呱呱直響，帶在身邊的餛飩也不敢吃，只好喝點涼水裝肚子，想把餛飩留給弟妹。到中午，我哥又聽說西貨場來了貨，立即趕去，等輪到我哥哥的時候，活兒又光了。一直等到太陽西斜，還沒拉上一趟貨。天氣熱，哥心里煩躁，走到海河邊想洗個澡，涼快涼快。誰知河水的水，上溫下涼，我哥又是空肚。一下河，關節炎舊病發作，就被水卷走了。

我們一家人趕到河邊，看到我哥的衣服擱在岸上。爛布包里還有兩個餛飩。托船戶把我哥哥的屍體撈起來，那里有錢埋葬？我媽只好帶我和弟妹幾個，到貨場一帶向人求乞討錢。可是，窮哥們都是一個樣，他們把手伸進口袋，也掏不出什麼。這時候，有個把頭背着錢袋走過來，看到我媽就虛情假意地給張羅，讓我們跟着他到處向貨棧老板們求乞磕頭。我

們娘儿几个从晚七点磕到夜十点，头也磕昏了，也不知求了多少钱，直到把头说行了，才回家。事就托把头給办了。

祸从天降

这真是祸从天降。把哥哥埋葬不久，脚行头就找上門来说：“赵大，埋你儿子共花了二十五块，給你垫了二十块，立个字据吧！”我爸一听真象冷水澆头，说话也不俐索了。他对把头说：“钱不是求来的嗎？”把头气势凶凶地说：“你昧了良心啦！賤不是明摆着嗎？”我爸越急越結巴：“这……这可怎么还呀！”把头嘿嘿一陣冷笑说：“慢慢还啲！用‘蹦蹦钱’还，你这輩还不了，还有你儿子，用大姑娘还……”我爸知道这債是訛人，死不认头。狗腿子见我爸这样，就一拥过来，拉的拉，拖的拖，逼我爸在字据上捺上了手印。俗語说：“‘蹦蹦钱’，‘閻王債’，拿七角当一块，卖儿卖女下关外。”閻王債十一天还不了，利上加利，一个多月还不上，本利相平。在旧社会里，就是这种“蹦蹦钱”，吸干、榨尽我們劳动人民的血汗。

走投无路

全家就还有我爸一个人挣点钱維持生活，再加上每天要还“閻王債”的利钱，日子更沒法儿过了。爸整天唉声叹气，老是在河边转悠，嘴里叨念着：“孩子呀！爸对不起你，爸要跟你走啦！”干活也常发楞。穷哥們把这些情况告訴我媽。我媽也看出我爸的神色不对，天稍晚，就要我到解放桥去等他，别出了岔子。有一天，我爸晚上七、八点钟还不回来。我就和弟弟在解放桥一带到处寻找。河边上有人站着，趁着月



光看，很象我爸爸。我們赶紧跑过去，想看个清楚。还没有等我們走近的时候，这个人就晃晃蕩蕩，沿着河边向王庄（现在的南站）那边走去。我和弟弟尾追着。这个人走的快，我們追不上，突然在人堆中看不见了。我們想起媽的话，要好生看着爸爸，也赶紧向王庄奔去。我們刚到王庄，远远就见一个人正拉起系在树杈上的褡褳要往脖子上套。这个人正是原来在河边上站着的那个人，我和弟弟顾不得細看，赶紧跑过去，扑到他跟前，抱住他的腿，“爸爸呀！……爸爸呀！……”爸沒想到我們在后面跟着，见我們这样，心也軟了。我們父子三人抱在一团，嚎啕大哭。我爸擦着眼泪说：“孩子！不是我心狠，想走这条路，是被人逼的呀！”爸拗不过我們，被我俩拉回来，一进门，我爸就跟我媽说：“把留下的半斤棒子面，全倒到鍋里去，咱們也吃頓稠的吧！”这时，媽还不知底細就問：“都吃了，明天怎么办？”我爸慢吞吞地说：“明天？……明天再说明天吧！”我媽刚转身，爸的神色突然又变了，腿也发抖了。他两手哆嗦着，从腰包里掏出一包什么东西来，就往鍋里倒，正好媽回身看见，一把搶过来一看，是包紅矾。我媽哭着说：“你好忍心呀！孩子都小，也得給他們留条活路，将来的日子长啦！……”

家 破 人 亡

可是，又怎么活下去呢？把头三天两头逼債！我爸只好白天拉貨，晚上又去拉胶皮，白天黑夜玩命干，想把閻王債快还清了。漸漸地，他眼眶凹下去了，脸上的皺紋也多了。可是閻王債却越滾越大，不到几个月，二十块钱已经变成五十多块。把头也明白，我爸再拼命也还不清“蹦蹦利”，就派

几个狗腿子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我們从两間破土房里赶出来了。弟弟正病在炕上，这么一惊吓，不久就死了。我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流浪在地道外。最小的妹妹，也是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我爸、我媽生我們弟兄姐妹十四个，有的冻死、有的餓死、有的病死、有的淹死，这一年就死了四个，加上以前死的，一共死了十个。这时，还只剩下我們弟兄四个了，加上爹媽，一家人只剩下六口人。

把头逼得我們家破人亡。去告他們嗎？官府和他們一个鼻孔出气，告状有什么用。穷人只能把仇恨埋在心中。

流 浪

也就在这一年，我九岁，开始跟爸爸拉“小套”。稍微大一点，长到十几岁，我爸被旧社会折磨得力气頂不上了，我就担起了全家的生活担子，象我爸和哥哥从前一样奔波。我在貨场拉貨、扛貨包，有时，也到“人市”上去找活儿。那时，解放桥一带是水陆碼頭，解放桥头、东車站、馬家口等地方，每天都有几百个衣衫襤褸、披着一片麻袋，或者是光着膀子、赤着脚的人，在等候出卖劳动力。每当貨物列車到站，或者轮船、木船要装卸貨物的时候，脚行头子就带着狗腿子到“人市”来买劳动力，他們大声喊：“要二十个扛大米的。”这时，等着找活儿的人就一拥而上。找活的人多，活儿不够做，搶不上活儿的就只好挨餓。晚上，好多人无家可归，夏天还好，就枕着半块砖，在河边上馬路上睡，冬天就惨了。天冷，人們白天围着烤山芋的炉子取暖，晚上就只得围着飯館門前刚熄灭的火炉睡。遇到刮大风下大雪的日子，常有人抱在一起，活活地冻死在火炉旁。那真是人間地獄。

在那个社会里，搬运工人就是这样被压在最底层，連起码的劳动的权利都没有，别的更谈不上。有一回，我拉着車路过耀华桥，看学生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踢足球，心里羡慕的不得了，就站下来边看边想：哪一辈子，我也能上上学，念念书哇！可是連想一想都没容我，猛听得一声吆喝，警察提着棒子赶来，把我赶走了。

重 利 盘 剥

搬运工人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那些騎在搬运工人脖子上的脚行头子，却是花天酒地，揮金如土。他們住的是高楼、洋房；頓頓吃的是山珍海味，养的肥头大耳；穿的是綾罗綢緞，戴的是珠光宝气……。“六号門”号称东霸天的大脚行头子馬文元，他作一次寿，吃酒的席棚就占了半个胡同，酒席一摆几十桌。作寿那天，一来就是几十辆小汽車的客。

脚行头子喝的是工人的血！搬运工人每天挣来的血汗钱，十之八九落入脚行头的腰包，自己拿到的不过十之一二，这还好，有的人脚行头随意給多少就是多少，还不准反抗。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物价一日数涨，把头还借机克扣，剝削工人。那时，上午干了活，脚行头收了貨主付的运费，扣着不发，拿去作投机买卖，几天以后才发給我們。原来可以买一斤棒子面的钱，連半斤也买不到了。脚行头子采用种种手段盘剝压榨搬运工人。有个脚行头子张玉春，一天就賺了棒子面三千多斤。

狼 狠 为 奸

解放前，在天津的貨場和碼頭，有脚行二百二十七家，

大小脚行头子三千零三十二人。他们霸占全市搬运事业，子孙世袭，代代相传。那时候，脚行头凭借所谓康熙的“龙签”和帝国主义的“执照”，霸据一方。他们组织和参加青帮、红帮、天地会、火神会、共济社、义子会等封建迷信组织，豢养许多流氓打手。通过这些组织，巩固和发展他们的封建势力，欺压和压迫工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这些脚行头子又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军统等反动组织，勾结反动派的警察、宪兵和特务。全市最大的脚行头子巴延庆，就是天津市国民党市党部的委员，伪国大代表，军统特务、“忠义普济社”的头子。这些大小脚行头子，依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鱼肉我们搬运工人。他们经常威胁我们搬运工人：“二爷用半天的钱，就买你这条狗命。”搬运工人翟大，就是给脚行李大头用钱买通国民党反动派的法院陷害死了的，死后连尸体也找不到。

天津解放，我们才看见青天。翻身后的一切都变了。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阶级恨，要牢记血泪仇啊！

（黎邦鐸 整理）

过去作牛馬 今天是主人

武汉市三輪車工人 陈春宝

解放前，我父亲陈远鉴是个拉人力車的工人，一天累到晚也养活不了一家五口人，生活逼得无法，只得将两个姐姐都給別人当童养媳；我在外面拣柴、拾菜，仍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飽肚的生活。那一年，父亲因长年在风里雨里拉車子，受湿过重了：两腿肿得象个小水桶，整天流水出脓，瘫痪在家里无钱医治，母亲牵着我到伪工会去，指望能求得一点救济費，誰知伪工会理事长赵世斌（解放后已鎮压）凶狠地说：“穷鬼，我們工会那有钱給你們治病！”他身边的狗腿子冷笑了两声：“哼！你們在做梦，到这里来要钱。”当时我的肺都快气炸了，不觉大声嚷了起来：“你們总在大街上拦着車子收会費，我爹月月交的会費都到哪里去了？”那家伙扑过来要打我，母亲哭着求情，才把我領走了。那年，父亲因沒钱治病，就那样活活地烂死了……

为了活命，十八岁那年，我也拉起人力車，资本家譏笑我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只能去打洞。”那时节，头顶別人的天，脚踩別人的地，不分日夜寒暑的在大街小巷跑呵，跑得骨瘦如柴，还是吞泪当餐。在内街的地面上跑，沒有一条好路，坑坑洼洼，成天吸灰尘吐黑涎；“租界”的

路好，我們不能进去，进去了就受巡捕的打和罰。中国的地方外国的主，那里有我們半点自由。

1941年5月，那时日寇統治着武汉。由于水陆交通不便，人力車就成了城乡之間联系的工具。当时汉川湖区有新四軍的稅卡，我经常往返这一帶，所以有时就秘密地給他們带点医疗器械和药品，或代商人向稅卡办理納稅手續。这些活动，被日寇晓得了。有一天，我在永宁巷街口，忽然迎面跑来五六个家伙，一拥而上将我拳打脚踢，说我是新四軍的密探，打罵之后給我带上銬，送到維新路日本宪兵队。他們不由分说，狠狠把我抵在墙上，一个日寇用枪托使劲地向我胸膛打来，打得我实在站不住脚，昏倒在地上，他們又用水将我噴醒，说，“你说了給你日鈔大大的，放你回家。”我把牙一咬，坚决不暴露新四軍的駐地。日寇见利誘不成，又拔出大刀要刺我的胸膛。正在这时，开飯的鈴声响了，他們才放下刀将我推到獄中，过了三天，由于逼不出供詞，才放我回家。臥病数月，才从死里活过来。直到如今，每逢天阴骨头作痛，我就記起帝国主义对我的压迫和摧残。

抗战胜利后，我以为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了，生活会好一些，那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統治下，生活同样痛苦。那时候，遇到狂风大雪，为了一家五口的生活，我还得披着蓑衣，赤着脚上街头招揽生意。有一次，我挟着車杆遊蕩到武圣路正街口，誰知碰到一个全副武装的蔣匪軍官，气势汹汹地踏上了我的車，用手一指，皮靴在車上乱蹬一气，威胁我快拉。沒有办法，我只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好不容易拉到集稼咀，他把脚一踢要我停車。他下了車就扬长而去。我抹着汗水赶上前去讨車钱，他不但不給，反身打我两耳光，踢

了两脚，还罵我：“叫你变人，你变畜牲做馬跳！”在那个时候，穷人苦无处訴，眼泪只好往肚子里咽。我回到家里，家里正等着米下鍋，一看到我被打成那个样子，大小哭成一团。我躺在床上眼泪汪汪地看着白发蒼蒼的老娘拖着大儿子德禱冒着风雪上街去讨飯……

旧社会还有封建把头在我們头上撒尿，那时伪工会是特务流氓头子把持的，他們同国民党一个鼻孔出气，也和資本家勾結，为非作歹。工会理事长赵士斌，身穿西装，腰佩手枪，手下一大批爪牙，专干压迫剝削的勾当，挑拨工人团結。如1948年夏天，他看到馬車的生意好，自己的收入减少，就在人力車工人中間煽动说：“馬車夺了人力車的生意，不赶走馬車，工人沒活路。当时有的工人受了愚弄，在五馬路口与馬車工人发生了流血械斗。結果反动派警察赶来，鳴枪弹压，还将人力車工人刘忠汉等逮捕起来，送到法院审讯。这时赵士斌却做了縮头烏龟，不过問了。这还不算，他还勾結資方，随意高涨車租，巧立名目，收捐收費，誰人拒繳，他就派爪牙拦路勒索。此外，他还侮辱我們的人格，誣人力車工人拾物不繳，逼着要我們穿上印有号碼的衣服，象犯人一样，有的車工沒钱买号褂，警察就抓去，说他是偷的車子。可是对車工的福利却一点沒有，冬天，你冻死了他不給一絲棉，夏天你渴死了他不給一滴水！記得有一天，太阳毒得很，晒得街道象火里燒了的铁板。有个資本家怕晒，坐上車要我快些奔跑。他说：“你快些拉，如果你超过了一辆馬車，就給你增加两枚銅板。”当时，我为一家吃口飽飯，不得不拼命和馬車“竞赛”，每超过一辆馬車，資本家就向赶馬的工人说：“你的馬不如我的馬車跑得快！”車快如风，資本家感到凉爽，我

却累得汗流如雨，受尽了侮辱！

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把头就是这样奴役我們。

解放后，人力車送进了“博物館”，我們都改踩三轮車，组织了合作社。車子坏了就送到修配厂及时修理，避免了停車现象，工人收入正常了。我們車工因在旧社会受的折磨太多了，患有肺病、胃病、关节炎、腿肿等各种疾病，过去因无钱治疗，有的失去劳动力，有的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现在，过去那些重病体衰的人都得到了适当的安置，不管轻病重病，人人都可以免費和減費到医院和保健站去治疗。桥口区社十二車队車工肖树应，过去患严重的肺結核，现在已经完全治好了，他万分感激党救活了他的性命。我的一双腿子因过去受湿过重，象父亲那样，潰烂了三十余年，无钱医治，解放后保健站不断地給我治疗，有时十天半月不能生产，合作社就按章給予我生活困难补助金；去年毒疮复发，组织上让我到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就全愈了。我的胸部被日寇毒刑拷打后成伤，左膀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经治疗后，现在都好了。

想起这些，怎不叫人衷心地感謝毛主席、感謝共产党啊。

現在我們車工当了家作了主，生活福利真是说不完。每到夏天，组织上发給車工新毛巾和防暑药品，各个服务站有茶水和酸梅湯；冬季发給工人棉手套，还为夜班服务員购置棉大衣防寒保暖，又发給雨衣，以便雨天工作。特別使人感动的是：合作社的領導和干部不怕暑天炎热，到江汉桥和长江大桥头，給我們倒茶倒水，送毛巾擦汗，干部还幫我們推車。去年一天，我拖貨上江汉桥时，幫我推車的是我們的党委書記許文珊同志，使我心里几天不能平靜。现在的交通民

警同志，也经常幫助我們推車子上陡坡路。有時踩車上坡時，有些青年幹部、工人和解放軍乘客就急忙下車幫我們推車。這一切是我們過去做夢也沒想到的呵！

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我還進了文化業餘學校學習，文化水平提高到初中以上程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出席過武漢市群英大會，成為武漢市特等“擁軍優屬模範”，擔任了武漢市三輪車合作社管理委員會的委員。現在我一家六口人，大女兒參加了工作，小的兒女也上了中學和小學，一家生活過得很幸福。

兩個社會，兩種政治地位，兩種生活，沒有親身經歷的人是難以想象得到的。我要時刻不忘階級仇恨，永遠聽黨的話，進一步作好“擁軍優屬”工作，為社會主義的交通事業，獻出一生。

从地獄到天堂

天津化工厂工人 苏玉勤

有一天，我領着两个女孩子上街去了，路过一座土地庙門前，特意到里边看了看。小庙的牆壁东倒西歪，沒門沒窗，里边堆滿了碎石烂瓦。她們天真地問：“爸爸，看这破庙干嘛？”我沉思了一下，心想，她們成长在新社会，这庙里的泪，这庙里的恨，她們怎能知道呢！我对她們说：“看看吧，这座破庙就是你們的一課书！”

晚上，她們問起看庙的事情。我就給她們讲起了过去。

咱們老家在天津南郊的葛沽鎮。我二十九岁那时候（1939年），咱家穷得一壠地也沒有，租种地主的园子地，累死累活地干一年，吃不飽穿不暖，末了，还欠下租子。地主逼着，说：“砸鍋卖铁也得把租子交上！”逼得全家无路可走，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你奶奶受惊带气死在葛沽鎮。一家人哭了一夜，把老人用破席卷上埋了。家里沒吃的，第二天就拿着梯子讨飯去。秃子他媽，每天上地挖苦菜，我和秃子的哥哥每天要飯。富人家要不来，穷人家沒有剩飯。两个人要一天还不够自己吃的，哪能顾住全家五口呢？

邻居們怕咱全家餓死，都说到外边找活路吧。我想，也許能行，我餓死不要紧，別把孩子餓死了，他們还小哩。为

了不被餓死，我用扁担挑着七岁的秃子和他五岁的弟弟，領着秃子的哥哥和他媽媽上路了。

动身时，除了要来的糠醇剩飯，野菜团子，一点盘費也沒有。

开春的风沙，天天刮个沒头，在荒野里行走，大人睜不开眼，孩子哭哭叫叫，想找个避风的地方也找不到。可是，肚里餓得咕咕叫，哪有劲挑他們两个呢。我挑一会就得歇一会。秃子那时候瘦成一把骨头，眼窝子塌得象酒盅一样，站起来风就可以吹倒他，他哪能自己行走！

来到了塘沽，心想好好歇歇脚吧，这是个大地方，給孩子們要口飯吃，攢攢劲再往前走。誰知道在这里要飯比在乡村还难，大工厂进不去，商号里連在門口站站也不让。喊爷爷叫奶奶，得到的回答是“滚出去，再来这挡道，打断你的腿！”有一次秃子的哥哥到一个飯館要剩飯，那时候要飯的人也多，不知是誰偷了人家一个饅头，掌柜的錯以为是他偷的，沒头沒臉的就是一巴掌，一下子打倒在路沟里，护家狗也依仗人勢，上前就咬他的大腿，要不是行路的好心人把他拉起来，就得被狗咬个肉烂。他含冤抱恨地走回来，一点飯也沒有要到。他媽一见，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擦不完。她劝大孩子要小心留神，不好要的地方就别去要。可是，恨誰呢？我说：“别再让孩子难过了，穷人挨打受气，哪有说理的地方！”

就这样，一路上吃苦要飯，哪黑哪住，街头巷尾、馬路沟、大树边，就是穷人的炕头。葛沽到汉沽不到百里路，我們就走了七、八天。要不是心里有个盼头，盼望到汉沽找点活干，这一段路再走十天也是走不完的。

可是，到了汉沽怎么样呢？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那里也没有穷人的活路，到那里还不是受气挨饿。这里上无亲戚，下无朋友，沿街要饭的人成群结队，他们找不到事作，咱哪能找到！我后悔不该来这里，有心领着孩子返回去，可是，返回去不还是照样挨饿！这百把里路就是鬼门关，闖不过去，十有八九就得死在半道上。我对秃子他妈说：“那里也没有咱穷人抬头的地方，豁出五条命，咱就在这里混吧。”白天，全家人分头出去要饭，晚上，一家人就住在那间土地庙里。这破庙你们都看见了，一个门洞，两个没框的窗窟窿，冬天大北风直往屋里灌，热天蚊子成群。可是，再脏再臭也得住。地主资本家住高楼瓦房，穷人没房没地，不住这住啥！要是遇上刮风下雨，不能出门要饭，一家子就得挨饿。

这样过了半年，有人对我说工厂招人。磕头作揖，死说活说，我算进了东洋化学厂（现在的天津化工厂），当建厂杂工。那时候，每月挣四十斤粮食，说是粮食，其实净是糠皮，哪够五口人一个月吃的。有了病不给粮食，出了工伤也不给粮食。就是发下了粮食，把头、狗腿子还要剝削你，把好的给你换成次的，把次的给你换成更坏的。要是高兴了，他们就发给你，不高兴，就不给。咱们没吃的，秃子他妈还得抱着二小子挨门讨饭。

不料正在困苦难熬的时候，秃子他哥被日本鬼子抓劳工抓走了。我在厂里干活，一点也不知道。家里正指望他要点饭吃，他这一走，孩子们吃啥呢？秃子的妈眼皮哭肿了，抱着孩子在庙台上等我回来，盼我想个办法搭救孩子。可是，那个世道谁还敢去讲理！我们忍冤含泪，到车站去看望秃他哥，他被关在一间黑屋里，说是很快要被火车运走。他见妈

媽来看他，滿腹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了，低著頭直哭。他媽把留著給三小子吃的兩個仅有的糠窩頭給了他，讓他別忘了爹媽，不管走到那兒，要來個信。禿他哥知道兄弟們都沒吃的，不肯接過那兩個窩頭，在窗口讓來讓去，看見這，我的眼淚也流個沒完，我說：“你媽給你，就收下吧。爹養了你這么大，想不到落到這樣的下場，以後，你要能回來，就想法回來！”誰知道這么一說，惹了禍，看門的警察把窗子咔嚓一關，我們再也看不到他了。眼淚只好往肚里流。他走時，才十二、三歲。從此，就再也沒見他的面，後來才聽說他被折磨死在煤窰里。

這以後，生活越來越困難了，天氣越來越冷，三天兩頭刮大風。我和孩子們還穿著漏肉的单衣，在廟里凍的坐不住，要飯更出不去了。我每天下班回來，總要到工廠大伙房裏要點泔水，自己舍不得喝，留著給孩子們吃。要來泔水多吃點，要不來就餓著。

有一天夜里，餓得我實在睡不著了，起身就要上工廠去，想要點泔水來充飢，禿子他媽攔住我說：“孩子他爹，這么冷的天，你還穿著单衣服，把我的棉褲穿去吧。”她說著，便把她那舊棉褲脫了下來。我說：“我穿了，你穿啥呢，在廟里不是更冷嗎？”她硬遞給了我。一個男人怎能穿紅褲呢？不穿吧，太冷，我想了想，便把它翻了個里朝外。

到了廠門口，日本兵問我干什麼的，我說上班的（如果說要泔水是不行的）。渾身上下把我搜個遍，什麼也沒搜出來，還不叫我走，逼著我把衣服脫了。不料這一脫，日本兵大驚大叫起來：“啊，你的紅軍的干活，八路！”他們睜大眼睛看著紅褲子，忽然，從兜里取出哨子嗚地吹了起來，十几



个持枪的鬼子兵，不问青红皂白，把我绑在电线杆子上。一个日本军官大声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工厂的工人。”他摇摇头说：“你的八路密探，红军！”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子。他们不信，强迫我承认是八路军，便用铁丝把我两个大拇指紧紧攥在一起，铁丝上拴着一根绳子，把我吊在警察室的房梁上。我只觉得钻心的疼，棍子、板子又噼里叭啦地打在我身上。冻紫的肉皮流出了鲜血。后来头一昏迷，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們用凉水浇我的头，我渐渐清醒过来。这才知道我已经躺在冻地上。他們还是逼我承认是八路军密探。我咬着牙没说一句话。他們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更凶狠起来。只见随着日本军官的手势，上来几个兵把我架起来，我知道他們又要来新的酷刑，我想，来吧，反正是这一条命。恨，我深深地记在心里。他們从火炉里夹出通红的煤块往我身上烫，背上的肉，烫得滋滋地响，一种难闻的焦臭味充满全屋。他們还是不放松，一块接一块地往身上烫，直到我再一次昏了过去，他們才放下火钳，把我扔出屋外。

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厂门口拥挤着进厂的工人，大家见我被打成这个样子，誰能不生气呢？不知工友们说了多少好话，才把我放了。工友们含着泪水，忍着愤怒，把我抬到那座破庙里。秃子他妈见我成了这个样子，一头扎在地上痛哭个没完。怎样活下去呢？她心里的苦已经够多了，我又成了这个样子，大人哭孩子叫，要不是有这些孩子，我真不想活下去了。第二天，我的伤口肿得老高，不是工友们借给钱买药膏，我哪能活下去！

一晃七天过去了。可是，人歇着，肚子可不能歇呀！一家人靠我吃饭，我只得强打精神，忍着疼痛去上班。别人的粮食发下来了，偏偏没有我的粮食，他們说七天不干活不给粮食。世上就有这样的冤枉，干了活，挨了打，粮食还不给。我把这事向工友们说了，大家气急了，全说找日本人说理去，不给苏玉勤粮食就不干了。这事传到翻译官耳朵里，日本人害了怕，才发给我一个月的一半粮食，那一半就硬不给了。

敌人的心，就是这样的狠毒！他們明知道咱全家忍饥挨饿，还要克扣你的粮食。我为了给家里省点粮食，晚上下了

班不回家，便到大伙房要点泔水，自己喝一点，給家剩一点。誰知道就在这两三天內，三小子在庙里餓死了。他媽沒有衣服，不能出門，等着我下班埋掉他，一直等到第二天，还不见我回来。不能光守着尸首，她便叫秃子去把三小子扔掉。秃子那时候才七岁，哪能抱动五岁的死孩子，他又怎能忍心把弟弟扔掉呢！他把弟弟抱到了沟边，再也抱不动了，又不肯把弟弟扔掉，守着死去的弟弟在沟边呆呆地站着。邻居們告他说去找你爸爸吧，他才想到厂里找我。当时我一听，心象碎了一样，一家人眼看着一个一个死掉了，还有什么活头呢！有心不再去看三小子，可是不能把孩子扔在沟边呀！我含着泪水，把他埋在沟边。走回家来，见他媽下身围着一片破麻袋坐在地上，連气带餓一步也走不动了，脸肿得黄蜡蜡的，渾身上下全肿起来了。我递给她一盒泔水，她放在一边，说：“給孩子留着吧。我死了，也别让秃子再死了，他是咱家的根，长大了，叫他知道媽媽是怎么死去的。”我一听，心象刀绞，禁不住流下泪来。有啥法呢，旧社会把人逼成这样子，沒地方出气，沒地方说理。泪水填滿了肚子，哪还再想吃，我劝她吃一口，她不吃。为了給家里挣口飯，我忍着飢餓又去上班了。临走我对秃子他媽说：“吃吧，为了活下去，咱不能不吃，明天我給你多要点泔水。”

其实，哪能多要呢，厂里的泔水，全被伪警察把持着，他們说喂了猪能吃上肉，喂了穷人是白搭。要不是有好心的炊事員給我偷偷留点，向警察磕头也要不来。我说多要点，是安慰她呀，她要再有个好歹，留下孩子可咋办呢！

这时，破庙我們也住不成了。村里的富人們嫌我們把庙住髒了，硬逼着我搬进一个比庙还潮湿的看守菜园的小泥棚。

里，进去站不起身来，只能在里边躬着腰走。我上班后老是担心下雨天会把他们砸死。

三小子死后不到七天，外边大雪纷飞。我正在锅炉房满头大汗地干活，秃子忽然哭着跑来对我说他妈死了。

刹时，我象傻了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呆地站在门口，望着漫天大雪。工友们问我出了啥事，我说不出来。我头前走，秃子在后面紧跟。到家里，他妈的身子已经冰凉了，硬挺挺地躺在潮湿的草窝里，雪花飘进屋里，落在她的身边。看得出来，她昨天晚上就死了。临死，我没有和她见个面，也没说一句话。

泪水，已经哭干了，我不再哭了。我知道她是怎么死的，自从大孩子被鬼子抓走以后，她的气，一天天多，她的恨，一天天深，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填不饱。是谁给她带来的恨呢？是万恶的旧社会，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地主、资本家、反动派……

活着，有苦他们不管，死了，他们更不管。秃子妈的尸首躺了三天，想埋葬，工厂的资本家不借给钱。还是工友们帮助咱，借了领席，算把她埋葬了。从此，我离开了这座四面透风的泥棚，全家五口死去三口，我和秃子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可是，我还得上班，把七岁的秃子放在哪呢？再放在庙里，被人偷卖了咋办？让他进工厂，警察象狗一样在门口把着，不让进去！但总不能把他放在街上不管。从死里走过来了还怕什么，我大着胆子把他领进厂来。警察拦着不让进，我说：“家里死得没人照顾他了。”他们说：“滚，谁问你这个！”举起枪托子就往外赶秃子，我憋了一肚子火，就和他

們讲起理来。工友們围了一大圈，全替我说话，警察见苗头不好，怕把小事鬧大了，才答应把他带进来，不許他来回走动，只能在一个地方呆着。就这样，到上班的时候我去干活，下了班，爷俩盖着一个草袋子睡在烟囱旁边。大鍋內灑出的滾开的卤滴，时常燙在我們身上，烟囱里冒出的黑烟，熏得睡不着，实在沒办法了，就用洋灰紙蒙住头睡。一直到汉沽解放，我們才从这个黑暗的臭窝里走出来。我們这些从前受压迫受剝削的工人，现在成了主人，政治地位提高了，生活也改善了。

不是新社会，我哪还能建立新的家庭呢！

不是共产党，你秃子哥能翻身嗎！

现在，我們全家住的是新工房，大儿子和大女儿也有了工作，和我一起在天津化工厂工作。三个小女儿有两个已经上了学。領導上對我們上了年紀的工人，处处关怀照顾，就是有点头痛脑热的小病，也亲自来家看望我們。全家人高高兴兴，不愁吃不愁穿，和过去比，真是天上地下。思前想后，我不能忘記过去，也不能让孩子们忘記过去。1962年春节，秃子領着媳妇来向我和他继母拜年。我們全家九口欢聚一堂，我就又想起了土地庙里的事。我说：“现在咱們生活在天堂里了。在旧社会咱們該多么苦啊，有誰知道这座庙里死过多少人呢？你們要記住这座庙，記住咱們工人階級的血泪史。”

（韦野 整理）

記住这血仇泪恨

沈阳冶金机械厂工人 王殿文

从旧社会过来的穷人，誰沒有血仇泪恨？大江有头，大海有边，穷人在旧社会遭的苦难，无边无沿。

就从我十二岁说起吧！

那年，是伪滿康德元年（1934年），我們家在本溪小市磨树峪的碗沟住。这个地方，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一天到晚，听的是虎嘯狼嚎野鸡叫，看的是獐狍野鹿滿山跑，见不着个人影。怎么在这个鬼子不拉屎的地方住？咱房无一間，地无一壠，任嘛沒有。种好地，得有牲口、有粪、有鋪垫，咱沒有，地主怕把地种薄了，不租給你；就是租給，租子重的要命，打粮不够交租子的，咱也种不起。山沟薄地，租子轻点，边边拉拉开点荒，不上粪也种几茬，待地劲沒有了，再挪个窝儿。

当时，我家人口很多：有爷爷、奶奶、两个叔叔、一个姑姑、爹、媽加我們弟兄五个。全家十二口，挤在三間房盖不遮雨、牆不挡风的破草房里，过着断鍋掉頓，少吃缺穿的日子。

可是，就这种苦日子，也不让你过长远啊！

那时候，抗联的队伍，在咱那一带活动。打了不少胜仗，

揍死不少日本鬼、警察狗子。日本鬼子为了割断老百姓跟抗联的联系，消灭抗日队伍，想了个绝招：并屯。七天期限，住在三沟六岔、老岭背后的人家，都得并到几个大屯去。我们家，叫往磨树峪并。

眼下就是八月节，忙了一春捎一夏，总算苞米干了叶，荞麦谢了花，高粱晒红米，谷子摇黄穗，到开镰割地的时候了，怎舍得离开？

8月13，天傍晚，我们全家围着桌子，正待吃顿稀饭，警察狗子领着群日本鬼子来了，先把房子围上，一个警察，一个鬼子前后进了屋。

“七天期限过了，怎么不搬家？”警察瞪着眼问。

“有点庄稼没割，再容几天空，收拾完了就搬。”我爹一面让坐，一面陪着笑脸说。

“什么就搬？你的红胡子的联络有，八格牙路！”鬼子瞪着凶神恶煞的眼睛，上去就是一顿耳光子。

“统统地滚，滚！”

全家被赶出了屋。鬼子拿枪刺着我爷爷、爹爹、老叔；我媽抱着小弟站在院子东头的碾子跟前，姑姑躲在奶奶身后，依在杖子上；我们哥四个挤在一起，大气不敢出。这工夫，就看刚才进屋的鬼子手一摆，几个鬼子上前往房上浇火油，四面点火，房子呼呼地着了起来。我奶奶一看什么都完了，就呼天嚎地地哭起来。我爷爷刚要转身想进屋去抢点东西，被鬼子拦了回来。眼看房子落架了，我爹急了，拔开鬼子的刺刀，一跳窜上窗台，鬼子一楞，抹过身朝着我爹的腿就狠狠一枪把子，我爹一头栽下来，昏了过去。趁全家捂弄我爹的工夫，几个鬼子把我姑姑架去，给糟蹋了。我媽一看，



沒活路了，捧起碾盘底下的卤水罐子，喝了下去。待等把我爹捂弄过来，再看我媽：她左胳膊摸着不滿生日的小兄弟，右胳膊支着地，靠在碾盘上，身子都硬了。可我那不懂事的兄弟，还趴在媽身上，含着奶头吃奶呢！

我爹爬过来，搖着我媽的身子，泣不成声。两袋烟以前，还是个人家，现在呢，一把火烧得片瓦不剩。人伤的伤、糟蹋的糟蹋，媽媽的尸首躺在碾盘下。沒有一个筐箕，沒有一根棍子，沒有一块站脚的地方，这可怎么办啊！我爷爷咽下

滿眼的泪，站起来，对我们说：

“死了的，就死了罢！活着的，还得过。哪里黄土不埋人？你媽自个选了地场，就在碾盘底下挖个坑，埋了吧！……”

全家人哭着、叫着、流着泪，用棍子掘，用手指头掘，在碾盘跟前扒了个能容下一个人的坑。全家哭哭啼啼的埋了我媽。爷爷、老叔抬着我爹，奶奶搀着姑姑，二弟领着三弟、四弟，我背着五弟，我们走了三步回头看，看看烧得片瓦不剩的家，看看空墙框子；五步转身望，望望碾盘眼前的新坟，望望媽媽。走啊，可到底往哪走啊！天底下，大路小路千万条，哪条路容咱穷人走，大家小家千万家，哪里能安得下咱的家？

并到磨树峪，街坊邻居帮着，搭了个不挡风不遮雨的馬架子，全家住进去。我爹因为伤心，上火，伤一天比一天重。到八天头上，天傍黑，我爹不行了。临咽气的时候，他把我爷爷、奶奶跟我们兄弟五个，叫到跟前，左胳膊挽着我五弟，右手扯着我，脸朝着我爷爷、奶奶说：

“爹，媽！……我不行了！孩子們以后别打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记住咱家的仇……”我爹扔下白发苍苍的父母，最大的十二岁、最小两岁的孩子，死去了！

打那以后，爷爷领着老叔和我，跑百家門，要着吃。要飯吃，难啊！嬖子大娘叫九千六百句，还混不飽自个肚子，何况家里还有五、六张嘴等着！有一天，我在張家堡子要飯，看见一个穿戴很地道的娘們，端着碗饅大米飯往狗食盆里倒。我好说歹说，苦苦哀求：大嬖子，行行好吧，我兄弟有病，两天沒见个米粒了，救个活命吧……”总算把碗飯要下来

了。我滿肚子喜歡，端着飯往回跑。哪曾想，剛走到村頭，碰上了個警察，他見我端着大米飯，瞪着雙三棱眼，一把扯住我：

“好大膽子！吃大米飯，國事犯，不知道？”

“我……我……是要的！”

“什麼要的！”一耳光子，打的我一踉蹌。

“是要的……”

“在那要的？走，領我去！”

我領他回到原先那個門，告訴就在這個門要的。他不言語了。立逼着我把飯倒回狗食盆里，一脚踢我老遠，伸着脖子喊：“滾，快滾！”以後我才知道，這是他的家。

因為沒吃的，我四歲的四弟，活活餓死了；我十九歲的姑姑，連吓帶病又餓，也死了。前後不到一個半月，那個萬惡的舊社會，就折騰死我四個親人！在外堡香鋪干活的二叔，聽到信，回來一看，家不象家，人死的死，亡的亡，他就上了山，參加抗日隊伍，打日本鬼子去了。以後，聽說他在韭菜峪和日本鬼子打仗時犧牲了。

自从我爹死后，我爷爷、老叔給朴家堡子的地主朴玉樹扛年頭，一年混個半飢半飽；我奶奶領着我、二弟要着吃，拉扯我們哥四個過。我稍大了點，也雇出去，給老朴家放豬、放牛、當半拉子，一直到我十八歲。

十九歲那年春，災難又來了，警察狗子給我們安了個罪名：說我二叔上山，跟抗聯打過日本鬼子，反滿抗日。就把我、我老叔、二弟一塊抓了去，送到本溪柞子石礦當勞工。當勞工，可不是人受的！一天只給六兩高粱米，淨喝一個粒跟一個粒跑的稀粥，餓的直不起腰。干活不論鐘點，五冬六

夏是天亮上工，天黑下工，少者十二、三个钟点，多者十七、八个钟点。监工的，象影子一样不离身，稍一打迟儿，轻者罵、重者打，看你不順眼，棍子就上身。有病了，受伤了，算你倒霉；死了，拖出去喂狗。到矿山上当劳工，就算羊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沒回路。我老叔、二弟就是死在矿山上的。

那是伪滿倒台的前一年，刚开春，地还没化透，脚踩下去，一蹴一滑的。那天早晨，下毛毛雨，我們順着矿坑頂上的小窄道去上工。道滑，不好走，我老叔走慢了几步，日本監工的，朝我老叔的后身就一脚；我老叔一閃身，地滑，沒站住，就从矿坑頂上跌了下去，再沒上来。待我連滾帶爬地跑下，我老叔早摔成一摊肉泥，連块骨头渣也沒拣起来。我紅了眼，抄起个家什，去和日本鬼子拼命！叫一些穷哥們拉住了。也是啊，在那个社会，慢说看的那么严，連鬼子的汗毛也碰不着，就是一命抵一命，打死他一个半个的，又能怎么样呢？旧社会的穷人啊，只好眼泪往肚子里咽，仇恨記在心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过不多日子，我二弟也叫鬼子活活整死，死的更惨！那时，我二弟在矿上的铁匠炉干活，打铁釘子。五月初，铁匠炉柴油机上的皮带丢了，是日本翻译串弄外面人偷去的。矿上追查，他們怕犯事，就往我二弟身上賴。我二弟不认賬，就把他弄到日本宿舍，狠狠揍了一頓，打的皮开肉綻，我二弟还是不承认。他們就报告了警察署，日本警察署长小田和警务主任王朝富坐小汽車来了，不容分说，把我二弟头朝下、腿朝上，綁在凳子上，順鼻子往肚子里灌凉水。肚子灌滿了，再灌不进去了，就把根本

头棒子，放在肚子上，一头一个人往外压，压的順鼻、口窜水、窜血，我二弟还是不认賬。以后又灌汽油、灌小灰水掺狗屎，压杠子……。活活把我二弟折騰死了！人死了，拖在荒郊野地里，叫狗啃、狼咬、老鹰叨……

自打我老叔死了，我連气带伤心，得了场大病，在穷哥儿們的帮助下，总算沒死掉。我二弟叫鬼子折騰死的情形，是我病见轻以后，別人告訴我的。待我能走动了，拄着根棍子，到放我二弟尸首的地场看，哪还有个人影，哪还有一根骨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当时，就象万把钢刀穿心，呆立在那里，望着荒山、野坡，说不出话，哭不出声，淌不出一滴眼泪！直觉得天旋地转，我又昏了过去……

伪滿垮台那年，我二十一岁，赶上“国兵”年令，才沒死在这里。

“国兵”沒检查上，派了“国兵漏”（勤劳奉仕，也是种劳工），到苏家屯修火車道。这里的活，比矿山更累。一天十二、三个钟头，净挑土籃；吃食呢，一頓一碗带皮的高粱粥。未曾吃飯，先閉眼默禱三分钟。有一回默禱，我睜了眼，叫小队长郭本瀛看见了，連打了我六十个嘴巴子。他还要打，我急了，用胳膊一挡：

“怎么？还要打死人咋的？”

“打死你能怎的！”他转身就去找家什。这工夫，在我身旁的王适存，插了我一下：

“小王！好汉不吃眼前亏，装疯吧！”

我一听，对！就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子，眼往上翻，装起疯来。郭本瀛找来家什，一看这情形，也不好再打了。把日本鬼子找来，他們哇啦了一气，就把我鎖在个小屋里。

事到如今，就装吧！打那儿，我见人就骂，逢人就打，砸玻璃、摔饭碗……。日本鬼子、狗腿子们，对我的疯，也将信将疑，心里没底。第二天，派人送我到本溪南满医院检查。检查这关，不好过呀！有不少装病的，检查出来，不是枪毙，就是打死。我就看见个装腿痛的，检查出来，鬼子抄起把锤子就把条好腿给砸断了。反正检查出来，是个死，检查不出来，也没个好。轮到我检查，我使出吃奶的劲：拳打脚踢，一蹦多老高，四、五个人才捂弄住。鬼子大夫检查完了，把个驴脸一沉：“疯了的没有，装的，装的！”立时给我砸上手铐脚镣，押了下去。反正没个好了，到黑屋里，我闹的更欢了。把衣裳撕的一缕一缕的，鼻子、嘴、舌头，全弄破了，第二天复查，我先攒了口血唾沫，一进屋，哇地一口，吐在鬼子大夫脸上、身上。他一面擦脸，一面叫唤：

“疯啦，疯啦的，快滚，滚！”

这才脱过这一关。

后来，鬼子派人把我押回家。迈进门槛，家里人看我这个样，都傻了眼。我奶奶哭嚎着扑过来：

“我的天哪！老叔死，兄弟亡，你又怎么啦？天哪！还叫不叫人活啊！”我听的明白，看的清楚，爷爷老了，干不动了；弟弟还小，不能干什么，就指靠我了。可我哪，得装疯。不敢帮家干点什么。

在家，有时也在大街上、人多的地方摔倒地上，翻白眼，吐白沫子，装疯卖傻，逢人就骂，见人就打。有的时候，我也割把树条子，编几个筐箕，故意挑到警察署去卖，去闹。打这出了名，远远近近，三里五村的，没有不知道王疯子的。

真疯，也就罢了，假装疯，明白的事当不明白，知道的事，当糊涂，那滋味不是人受的！家里人，除了我爷爷知底细，别人都当我真疯了。六十多岁的爷爷，挣给我吃，我不能帮他一点忙；白发苍苍的奶奶，要给我吃，我不能给她拎拎筐；和亲人，不能说句贴己话，晚上睡觉，也提防着，怕说了梦话，别人听去，走了风声。老亲故邻，见了面，得骂人家，打人家，要笑人家……这哪是人干的！可是，在那个社会，象我这样情形，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

1945年8月，伪满倒了台，换上维持会，还是地主、恶霸当权，换汤没换药。我还是装疯。1946年5月，国民党来了，我爷爷偷着对我说，世道变了，不装也罢。我说，得看看。哪曾想，就在那天晚上，我三弟叫国民党抓去了，一去就石沉大海，死在外头。我一直装到1948年秋，共产党来了，解放了我们家乡。

1948年冬，一天，我们家来了个人。别人说是区上的马书记，我仔细端量，这不是住在小市马家庄子、和我一块当过“国兵漏”的老马吗？见了面，他劈头就说：

“老王啊！装到時候啦，现在是咱穷人的天下，该出头喽！”

打那以后，我不再装疯了。旁人以为是马书记用什么妙法，给我治好了呢。其实我心里明白。打那以后，我就象一头撞在娘怀里，坚决跟党走！

（纪彬 整理）

我在旧社会的遭遇

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工人 张宝林

我是哈尔滨林业机械厂的热处理工人。哈尔滨解放那年，我才二十五岁。可是，在解放前那二十多年里，我却尝尽了旧社会的苦。

我家三代，都住在哈尔滨。父亲和我，都是工人。象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我在旧社会受尽了说不完的苦难。

生 离

“九一八”事变那年，我刚刚十岁。当时，我家住在道外十四道街“姚锡九大院”。家里有爹、妈和七岁的妹妹。以前，我爹靠给资本家开汽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自从日本鬼子来了，我爹就失业了。虽然他天天早出晚归，求亲告友，总也找不到工作。那时，家里没有隔夜之粮，几乎天天都要断顿挨饿。

我爹失业一年多之后，有一个外号叫沈三麻子的车主，要雇他去开长途客车，跑哈尔滨到宾县这条公路。在日寇汉奸那样横行霸道、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的年月，开长途汽车是很危险的。我爹开始犹豫不定，妈更是不同意。可是生活逼的没有办法，不开车又怎样养活一家人呢？最后，我爹只好

和沈三麻子訂了開車合同。

转眼过了腊月二十三，全家眼巴巴地盼望爹回来过一个团圆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爹在开汽车去宾县途中，被土匪开枪打伤了。

就在我爹被打伤的第七天（那时刚过年不几天），资本家沈三麻子来了，他进门就问：“伤好了吧？”我媽含着眼泪告訴他说：“越肿越厉害啦！家里一个钱也没有，这么重的伤，不治一治哪能好哇！……”沈三麻子沒等媽把话说完，就截住了话头说：“这年头，兵慌馬乱，我打算把車都卖掉。”

我爹听了这话，明白了沈三麻子的来意，他急忙说：“沈掌柜的，如今我重伤在身，你可不能不管哪！”“怎么？让我管！我的車打坏了誰管？我不找你算賬，就算你遇着了善人。从今以后，咱们的合同就废啦！”沈三麻子说完转身就走了。

連伤带气，我爹的病情越来越重，在炕上一直躺到秋天。“屋漏偏遭連夜雨，船破又遇頂头风”。就在我爹在家养伤这一年（1932年），偏偏松花江发大水，淹了大半个哈尔滨。一天早晨我們刚刚起来，水就从門縫流到屋里来了。大水临門，逃命要紧。我們全家扶着伤病未好的爹，跑到南崗“老巴夺”門前的难民窝棚里暂时住下来。我爹在这里又得上了伤寒病，連爬也爬不起来了。

等到大水退了以后，我們却无家可归了。这倒不是因为房子被大水冲倒，而是在水灾以后，房租涨价，姚錫九（哈尔滨的一个恶霸地主，解放后已被处死）把我們原先住的房子高价租給了別人。这时候，天已经冷了，身上沒有衣裳，又沒有住处，逼得我們一家人坐在街头痛哭。后来，实在沒

法，只好到道外七道街住小店。当时，就靠着我媽給別人縫衣服、补袜底賺几个钱来养活一家。可是，在那样的大水灾以后，出来給人縫补衣服的人，比找人縫补衣服的人还多。我媽劳动一天挣来的钱，有时候还不够一家人一天的店钱。

那时，我刚十二岁，就开始帮助媽养家了。我天天到垃圾堆里去拣破烂，多少能賺点钱回来。转年秋天一連下了七天大雨，拣破烂也不能干了。全家整天吃不上一頓飯。妹妹餓得摸着媽直哭。我餓的实在难忍，就趴在床上偷偷流泪。这时候，爹和媽为了找一条活路，他們白天黑夜地商量办法，可是，旧社会哪有穷人的活路？后来，死逼无奈，他們才背着我拿了一个骨肉分离的主意。

有一天，我拣点破烂换回一些煎餅，乐颠颠地回来了。奇怪的是媽满脸愁容，沒有一点高兴的意思。晚上，我躺在炕上，媽摸着我的头嘱咐说：“宝林，以后，你要小心馬路上的車馬啊！……宝林，从今以后你要好好地照看你爹！……”说着，说着，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淌，看到这种情形，我感觉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翻身起来，拉着媽的手着急地問：“媽！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啦？”这时，媽满脸泪水，痛苦地告訴我说：她要領妹妹到辽宁省新金县姑姥家去。我听说媽媽要走，一下子扑到她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我说：“媽！咱們死也死在一起，你千万不能走啊！以后，我多拣点东西！我去卖烟卷！我去当小工！我能养活全家！”媽听了我的话，哭出声来说：“孩子，世道艰难，养活四口之家太难啦！常言说：人挪活，树挪死。听说新金县招女工，我去挣几个钱捎回来，那时候你和你爹再去。我挣不着钱，就和你妹回来。”

生离死别的痛苦，使全家都哭成了泪人。我终究还是个孩子，哭着哭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等我醒来，天已经亮了。睁眼一看，只见爹瞪着两只红肿的眼睛，呆呆地瞅着天棚。我的枕头旁边放着洗净、补好的衣服。啊！妈妈、妹妹不见了。我哇的一声哭出来，猛地跳下炕就往外跑，爹一把拉住我，说：“别去撒啦！听爹的话。你妈是为咱们全家谋活路去啦。你到车站去找她，不更揪她的心吗！”我听了这话，扑到爹的怀里哭起来。

死 别

从妈走后，就剩下我和爹两个人。一天晚上，我回到小店，爹突然不见了。我着急地问：“我爹到哪儿去了！”店掌柜冷冷地告诉我说：“你爹让慈善会乞丐收容所拉走啦。”

“慈善会”，这个名字倒挺好听，可是它并不是什么“慈善”组织，实际上它是那些“慈善家”们借着收容无家可归的人为名，残酷地剥削那些还能干点活的穷人的魔窟。

听说爹被“慈善会”抓走了，我转身就要去找。当时被一起住店的关老大娘拉住了。她说：“孩子，那地方不能去，你在外面，每天送点吃的进去，还能保你爹一条活命。你若是也去，让你在那儿干活，那你们就全完啦！”我听了关大娘的话，以后天天都送点吃的去。可是，这万恶的魔窟始终不准我进去看爹一眼，只能由他们把东西转递进去。

就在我爹被抓走的第五天，我又去送东西的时候，一些人在收容所门口看一块黑板上写的招领尸首的通知。当我听到别人念有“张振华”三个字时，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就是我爹。可是，一打听年龄、籍贯，一点不差。我怎么也没想

到刚刚三十三岁的父亲，真的被他們害死了！

我听了这个凶訊，眼前直冒金花，一下子昏了过去。当我醒过来以后，收容所的人告訴我说：“限三天来領尸，过期接无主尸处理。”我心里想：不能买一口棺材，也得有一領席子，好把爹的尸首卷出去埋了。可是，买一領席子的钱又到哪里去弄呢？

第二天，我找到了爹的朋友杨寿春；他帶病到当鋪当了几件衣服，然后和我赶到收容所。只隔一天，揭示板上的死人名字全都換了。我們一打听，原来是人死的太多了，停尸房已经攔不下这么多尸体了。我爹的尸体在三个钟头以前就被拉出去了。我們赶紧跑到太平桥貧民义地，可是，等我們赶到，爹的尸体早被扔到万人坑里找不到了。

唯一的靠山沒有了，以后怎么活下去？我当时趴在地上哭的死去活来。最后，杨寿春大叔把我拉了起来，他说：“宝林，你到新金县去找你媽媽吧！”我当时心里想：媽带着妹妹已经不容易了。我怎么能再去給她增加負担呢！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流浪的孤儿，继续靠拣破烂生活。

就在我爹死后的第三天，开始下雪了。一天比一天冷。我穿的很少，天冷，肚子就更餓。为了吃几頓飽飯，我含着眼泪把爹留下来的一个小行李捆也卖掉了。沒有钱，小店也不能住了，离开小店和我媽的通訊联系也就断了。

那时候，道外江填外面，是一片“柴草市”，在一垛垛草堆中間，有几个大水泥管子。我从卖掉行李以后，天天找几个和我一样命运的孤儿到这里来过夜。我們用茅草把管子两头堵住，在冰凉的水泥管子里鋪上一层草，躺在里面。茅草和破烂衣服，抗不住“三九天”的西北风，我的手脚全冻

坏了，天天流脓流血，右脚的大脚指头最后烂掉了半截，脚后跟也烂到了骨头。今天，我的脚后跟上还有很大的伤疤，我的右脚大脚指上，只剩下比大米粒略大一点的一块脚指甲。这伤痕，这断了的脚指，就是旧社会留给我永远不能忘掉的“纪念”。

学 徒

我十四岁那年春天，偶然遇见了表兄云化山。他当时在一家铁工厂里当工人，我恳求他给我找一个学徒的地方。过了些天，他领我来到当时在道外北十四道街的万盛东铁工厂。资本家看我长的又矮又小，骨瘦如柴，就摇着肥胖的脑袋，带答不理地说：“我收徒弟是要能干活的，象他这样的我不要。”表兄看资本家不愿意收，就忙解释着说：“他人小一些，可是老实肯干。别人学三年徒，他可以学四年。”资本家一看有利可图，装模作样地说：“那就看在你的面上，先收下他。可是要学不到四年得赔我的伙食钱。在这期间锤打火伤我概不负责！”

就这样，我总算找到一个学徒的地方。

那时候说是学徒，其实是给资本家当奴隶。我每天要给资本家到饭馆去挑“泔水”喂猪，替资本家倒尿壶、哄孩子……还常受资本家打骂。有一次资本家叫我爬到一丈多高的炉棚顶上去抹泥，由于泥桶又大又沉，一下子拖不上去，资本家抬腿就是一脚，把我从棚顶上踢了下来，摔的我头破血流，当时就昏了过去。多亏师兄弟把我抬了起来。在那个时候这些苦水能对谁讲呢？只好往肚子里咽。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非常狠毒的。每天早晨天还不亮，



資本家就把工人吆喝起来开炉打铁，等工人干起活来，他再回去睡觉。当时说是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压火”休息时间，可是一到这个时候，那个被人称为“赛姐己”的老板娘，就把表针往前拨；到了冬天打“夜作”，她又把表针往回拨。无论冬夏，工人每天都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的活。

我由于是最小的徒弟，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要伺候资本家，干活时实在困得厉害。有一天我给师傅打配手，钻铁活的眼，由于困，手一滑，一下子把手指绞到牙轮里去了，一个手指被轧掉一半，血直往下淌，疼的我眼冒金花，汗珠象黄豆粒一样从脸上滚了下来。这时，站在我身边的资本家不但不管，抬手就是一个大嘴巴，还恶狠狠地说：“耽误工，不干活，我自养活你！”

在那个时候当学徒工，连衣服也穿不上。我在烘炉上打铁，常年是上身光着臂膀，下身围着一个破麻袋片，铁锤一抡下去，通红的铁末四处飞，满身烫的是伤，现在我身上的许多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

那时我每天睡在潮湿的吊铺上，又没有被褥，结果长了一身脓疥，脓包鼓的象葡萄粒一样，一按直淌黄水，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找资本家，要求他支给我几毛钱，买点药治治病。资本家说：“长了点疥算什么病！等我给你找点药。”后来，资本家拿来一包黑乎乎的粉末叫我擦在疥上。擦过的地方立时就肿了起来，疼的我直打滚。后来一打听，原来资本家给我拿来的不是治病的药，而是打猎用的枪药。

我就这样一天一天熬过了四年学徒生活。在刚刚要出徒的时候，资本家一看剥削我的油水不大了，立刻就辞退了我。我苦苦的学了四年徒，结果等着我的还是失业。

劳 工

我被资本家辞退后的几年里，为了生活先后在哈尔滨、长春、綏化、阿城等地十几个铁工厂干过活，短的两三天，长的也不过几个月，失业、流浪的痛苦从来没有离开过我。1943年经师兄魏明山的介绍，我又到三棵树“机关車工厂”去做工。在这个日本鬼子直接統治的工厂里，每頓飯只发給一个发霉的苞米面餅子。活重飯少，实在难熬。为了弄到一点粮食充饥，有一天，魏明山領着我偷偷地到珠河县（现在的尙志县）他哥哥家里，背回一点米来。在回来的路上，我俩被警察抓去了，以“经济犯”的罪名判了一年半的徒刑，拉到鞍山铁矿当“劳工”。

到矿山去当“劳工”，能够活着回来的是不多的。我在这个人間地獄里受尽了难以想象的苦难。

每天早晨爬到山頂，連气也不容得喘，馬上就得往車上装矿石。一撮子矿石有九十多斤重，而車高过肩，要象举杠鈴一样把撮子举起来才能倒进車里。装一車矿石，渾身累的象散了架子。挨累不说，还经常挨打。这个矿山有一个叫“刘大鎬把”的监工头，他每天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鎬把”，见誰直一下腰，抬手就是一棒。我上山的第一天，就被他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不久，我被折磨的得了重病。那时，有病不能干活的“劳工”，要被送到“隔离室”。人到这里，就别想活命。病人还没有断气，就用鈎子搭到車上，扔进山沟里。我为了不进“隔离室”，每天只好带病去爬山坡、装矿石。后来，幸亏难友們挖了一些叫“串地龙”的草药，帮我发了汗，病才慢

慢见好了。

后来，鬼子听说我会打铁，就把我转到“昭和制钢所”，制造矿山工具。在这里和上山装矿石一样苦。一天，我拖着疲劳的身体刚刚回到工棚，工头又发出紧急集合的命令，叫我們继续連夜干活。这时我病刚好，虽然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也只得勉强去了。在下料时，我突然觉得天昏地转，当时就晕倒在压力机上，右手的中指被切断，无名指也被轧裂，鮮血流了一身。难友們把我送到“医务所”，日本大夫不但不給我治疗，反而癡笑着说：“不要紧，死了的沒有！”说着拿起剪刀一下子就把轧坏了的手指剪了下来。一宿的工夫，手掌肿得象饅头一样。当我第二次去“医务所”的时候，日本人指着我的手腕子说：“统统鋸掉”，我又气又怕地跑回工房，以后只好用些食盐水洗洗伤口。

1945年5月，我从鞍山死里逃生回到哈尔滨。哪知道，在这里不仅找不到工作，戶口也被注銷了。实在沒有办法，就只好再跳进火坑——第二次当了“劳工”。

新 生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了，我也随着祖国东北的解放，从日寇的劳工棚里解放出来。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軍来到了哈尔滨，成立了人民政府，我才彻底摆脱了旧社会的奴隶地位，成了国家的主人，真正获得了新生。1946年以后，我先后在哈尔滨亚麻纺织厂、新生麻袋厂当工人。1949年12月来到森工机械厂（也就是现在的林业机械厂）当工人。十多年来，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阶级觉悟有了不断的提高，认识到过去自己和千百万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

懂得了工人階級的地位，增加了工人階級的責任感。1952年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黨為了培養我，送我到省委黨校去學習過，使我更加懂得了許多革命的道理。1954年以後，我擔任了車間支部書記。在1962年，我響應黨關於加強生產第一線的號召，主動要求回到了生產第一線，當了熱處理車間的工人。

舊社會使我家破人亡，新社會我又有了新的家庭。在1946年我結了婚，1951年又和斷絕聯繫將近二十年的母親會面了。現在我的家庭生活很幸福。我和愛人都有工資收入。全家五口人，不缺吃、不少穿，干活時有干活的衣服，出門有出門的衣服。住的是有暖氣，有上下水道的樓房……。我現在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老大念中學，老二念小學。我自己正在業餘進修中等專業技術學校的課程。

從新舊社會的對比中，我深深知道，今天的幸福是怎麼來的。沒有黨，就沒有我，也就沒有今天幸福的生活。每當我回憶過去的悲慘遭遇，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更加憎恨舊社會，熱愛新社會，覺得渾身增加了力量；我經常提醒我自己：要永遠記住過去，要永遠不忘本，永遠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堅決把革命進行到底。

（王述純、楊克堅 整理）

“小鬼”造反

上海勤工造紙厂第一車間主任 薛勤生

我是 1945 年十七岁时从家乡江阴农村到上海勤工造紙厂当学徒的。同我差不多時間进厂的学徒，有五六十个。他們也大都来自江阴、无錫农村，并且和我一样，不是在乡下沒有飯吃，就是为了逃避抽壮丁才出来的。哪料到，我們跳出了虎穴又跌入了狼窟。一进厂，老板就向我們宣布：“学三年，帮三年，六年之內誰也不准出厂。”师兄告訴我：“每月只有剃头可以出去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两小时，而且要有管理股长开具‘門票’，門警才准許‘放行’；要是超过两小时，就要扣月规钱，还要罰下个月不准出厂剃头。”此外，他們还告訴我一些老板如何打学徒一类的事情，我听着汗毛都竖起来了。再望望工厂的那座鎖得紧紧的鉄門，阴森森的門口，站立着一个滿脸凶相的武装警察，我的心也发抖了。从此，我們好比进入了监牢，成了老板的一群小奴隶，失去了一切自由，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絕。

囚犯不如的学徒生活

老板对待我們学徒还不如对待一只老鼠。老板有个物資倉庫，里面堆着整包的大米，敞開袋口让老鼠吃。老板李坤泉

说，让老鼠吃饱，就不会去咬仓库里的其它物资。我们学徒吃的却尽是霉米、杂粮，还要掺上三分之一的石砂。就是那霉米石砂饭我们也吃不饱啊！常常饿着肚皮连续干重活，名义上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实际上要做十八到二十小时。学徒邹仁兴整整做了一夜，人已经发高烧了，第二天白天，老板还要叫他去扛料，他实在支持不下，刚坐下来想休息一会，谁知恰巧被老板撞见，当即被开除出厂。

劳动条件是糟极了。我们一起进厂的几十个学徒，白天黑夜交替着睡在炉子间上面的一块地上的稻草铺上。大伏天，下面炉子整天不熄，我们活象在蒸笼里受烤。我工作的柏油车间没有一个通风洞，瀝青气整月整年迷漫不散。学徒邹阿昌中毒生了疮，烂得死去活来，老板也不管。我的两只眼睛也因为长期受到瀝青的熏烤，从发红到发肿，后来肿得看不见东西了，就去向老板恳求要点钱医治。老板一听，踢了我一脚，骂道：“眼睛瞎掉，也是活该。”老板在每年正月初五开工头一天，总要耍一套花招：在车间里设香案，烧长锭，供了猪头三牲，领了我们几十个学徒朝着“五圣堂”磕头跪拜，说“保佑四季平安”。以后，学徒生病或出了工伤事故，就说你“求神不诚”，是“菩萨惩罚”，与他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我先后三次工伤，手掌割裂了，肩膀打伤了，还是忍着痛干活。

老板的生财之道

我们做牛做马地在厂里干了三年，老板越来越肥了。开厂时，他全部生财就是一台单网单缸的造纸机，屋顶上装一个柴油桶当水塔，再加上一个小小的炮仗炉子，同时在别的

造纸厂挖进几个技工，再招收了我们一批学徒就开工生产了。搞了年把功夫，他一方面对挖进来的技工说：“工厂困难，另请高就”；另一方面又在农村招来了一批新的学徒。过不了两年，他又叫将满师的学徒“另请高就”。就这样倒来倒去，不到三年，老板把三十多个技工停了生意，而勤工厂却从一台造纸机变成两台，厂房也扩大了，又开了新的厂，汽车、洋房也有了。纸业界人称他“纸老虎”。而我们学徒在生产上个个要抵一个劳动力，几十个学徒顶起了勤工厂半边天。可是，我们一个月的劳累，还只拿到五块伪法币的月规钱，半年加起来，还不够老板娘烫一次头发。这就是老板特别喜欢招收学徒的全部秘密。

逼上“梁山”

1948年的初秋，物价一日几跳，我们学徒的月规钱照常还是五块。我们再也忍不住了。开始，要求老板把五块钱的月规钱折合生活指数。老板连这样一个最低的合理要求也置之不理。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有一次，我和顾福兴、吴耀万三个人，第一次来到“衙门”（我们学徒把工厂叫“牢监”，把办公室叫“衙门”），恳求厂长徐绍良加点工资。福兴上去说：“我们做一个月，就是不吃飯，也买不到一件旧衬衣。”这时正好老板跨进门来。他二话没说，对准顾福兴伸手就是一记耳光，还骂道：“小鬼，还想穿衬衣？把介绍人找来，滚！”我们一看势头不对，连忙退了出来，再去计议。隔了几天管理员周大块头来对大家说：“你们的要求老板已经同意了。从本月起，一律照生活指数算，你们要好好工作。”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可是，盼呀，盼呀，好不容易盼到

月底，誰知拿到的月規錢還是老樣子。我們吃了一個“空心湯團”，於是就去找周大块頭。周大块頭裝着為難的樣子說：“我在老板面前說了不少好話，只是廠長沒有答應。”我們一聽，決定二上“衙門”找廠長。這次我們幾十個學徒一起去了。到了“衙門”口，老板一看我們人多，叫派代表進去。我們就派羅維湘等五六個人做代表。他們一進去，只聽得老板問：“你們來干什么？”羅維湘說：“我們的月規錢不夠用。”“誰出的主意？”“大家出的。”廠長徐紹良一聽，就跳了起來，一把抓住羅維湘的後頸皮，把他拎出廠門外。趕走了羅維湘，徐紹良又拍着台子对大家喝道：“誰不去上工，都象姓羅的一樣，滾蛋！上海灘上要一百只狗難，要一百個學徒便當。有本領跟我到警察局去！”大家一聽，氣極了，都吼了起來，說：“羅維湘是我們的代表，要走一起走！”刁滑的老板，一看我們人多心齊，心有點慌，就趁一個職員上來為羅維湘求情時，順水推舟地叫人把羅維湘喊了進來。我們一則看到羅維湘已經回來，二則考慮到徐紹良是國民黨骨幹分子，有自備手槍，一個電話就可以叫紅車子來捉人，與他面鬥要吃虧，就退了出來。晚上，我們聚集在宿舍里，羅維湘說：“老板弄圈套，我們也來耍‘花巧’。”大家問他怎麼個耍法？他說：“找個地方商量商量。”我們大伙來到了紙腳間，經過商量，決定第二天早晨四點鐘，趁馬桶車進廠開大門的時候，大家沖出去，到外面去罷工。

老工人的支援

这天晚上，我們大多沒睡着。第二天早晨廠鐵門“嘩啦”一聲响，我們四十個學徒就一窩蜂往外沖。值班警察冷不

防备，要关门已来不及，拉人又拉不住，急得直跳直叫：“来人哪！小鬼造反啦！”

进厂三年多来，我们第一次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大家象出笼的小鸟一样，跳跳蹦蹦来到了法国公园（现在的复兴公园），坐在草地上商量办法。罗维湘说：“工人罢工都到社会局去请愿，我们也到社会局去。”大家说了一声“同意”，就冒着秋风细雨，直奔伪上海市社会局（淮海中路比乐中学旧址）。我们一到门口，两个伪警察把枪一横，不让我们进去，一定要我们先去写好状纸。我们推了周乐华写好状纸。状纸上写着我们学徒牛马不如的生活，写着我们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有出厂自由。可是拿了状纸，那警察还是不放我们进去。雨下大了，大伙急了，正要向他说理，另一个警察就过来用双手推我们出去，气势汹汹地说：“去，去，去！谁有空来管你们这闲事。”这时，已是下午两点钟，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衣服湿透了，我们从清晨起，还没有吃过一顿饭，肚皮也饿空了。罗维湘带领大家先回到太平桥，在亚蒙大戏院（现在的大同大戏院）门口凑了几角钱，每人喝了一碗稀粥，打算回厂，等候回音。岂知，一到厂门口，老板早已通知门警：“罢工学徒，一律不准进厂。”大家听了都是一肚子的怒火，就在工厂附近开了个会，商讨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表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加不到工钱，争不到自由，决不回厂。”几个家在上海的学徒也表示：“我们家虽在上海，日里跟大家走，夜里跟大家睡，决不离开一步。”天黑了，哪里去吃夜饭呢？身边又没钱，怎么办？大家纷纷掏出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些零星东西——有的脱下身上的衬衣，我也解下了一个皮带，凑凑换了几个钱，买了些羌

餅算吃了頓夜飯。但是，到哪里去過夜呢？有人說，小菜場里落不着雨。大家就來到了唐家灣小菜場過夜。當夜，大伙的身上都沒有了一件干衣，幾個領頭的又擔心明天怎麼辦。正在困難的時刻，廠里的老師傅來支援了。聽說老板不讓學徒進廠以後，朱素泉、高步昌、王漢春等十幾位老師傅立刻發起救助活動，在工友中湊了一筆錢，連夜派了職員顧風池找到唐家灣菜場。顧風池一見我們，興奮地說：“你們一走，一號車、二號車都停起來了。老板硬要我們大家去開車，大伙兒推說‘頂手’都跑光了，開不出車。哈，這下‘紙老虎’平日的威風可施不出了。”大伙聽了可高興哩！第二天，老師傅們又幫助我們安排了住宿，分別住在幾位老師傅家。失業在家的吳萬興等幾位老師傅，也趕來幫助我們燒粥。雖然我們一天只吃兩頓稀粥，但是有了老師傅的支援，我們和老板鬥爭的勁頭更大了。

他們是穿着一條連檔褲子的

我們四十個學徒天天到偽社會局等回音，到了第六天，黃色工會頭子、偽造紙工會主席陳德寶在社會局門口出現了。他一看見我們，就堆起笑臉迎上來說：“啊啲啲，你們的生活實在太苦了。社會局看了你們的狀紙，說你們的理由充足。現在老板已同意加工資了。好吧，你們回廠好好去上工。以後的事，有工會辦理。”說完，就叫了二十一輛三輪車叫我們坐車回廠。一路上，大家高興得合不攏嘴，滿以為鬥爭勝利了。有人說：“到底是社會局主持公道。這下老板不敢再欺侮我們了吧。”誰知車子到了廠門口，那門警說：“老板有令，罷工的學徒一律不準進廠。”原來這是他們搞的“調虎



高山”之計！大家知道这次又上当了，个个气得发抖，立即又赶到伪社会局。到了那里，只见老板的汽車停在里面。我們要闖进去，伪警拦住不許。正在吵鬧不开，那陈德宝出来了。他又假惺惺地说：“你們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你們的行为不合法，现在老板不同意，社会局也就没办法啦！”这时，

我們看見老板李坤泉和厂长徐紹良大搖大擺走出社会局，跨进了自备汽車。大伙儿一看，肺都气炸了，爭着要冲过去与李坤泉评理，要上去把李坤泉的汽車砸烂。可是，伪警端起枪气势汹汹地阻拦着，我們只得眼看着汽車扬长而去。这时候，大家才认识到反动派、资本家、黄色工会头子是穿着一条連档褲子的！

又进了“牢監”

十天过去了，处境越来越困难。老师傅們援救的钱已吃光，身上能卖的已卖光，饥饿威胁着我們，但罢工斗争还是继续着。这时老板李坤泉又使用了一条毒計，一方面叫来一些临时工，威胁厂里老师傅開車；另一方面又叫他的哥哥、外号叫“阿坤老太婆”的出来活动。我們这些学徒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从家乡招来的，“阿坤老太婆”还是介紹人。因此，他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学徒一个个找来，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说：你們都是我介紹进厂的，有啥困难和我来商量，你們要給我一点面子，不要使我为难。”一部分学徒为生活所迫，又被老板这种軟硬兼施的威胁拉攏，开始动搖了。沒几天，就有二十个学徒被拉回了厂。过了一星期，又有十二个被拉回去了。最后，只剩下了我們九个学徒还坚持不回厂，一直坚持了四十五天。后来，老师傅們来劝我們说：“暂时忍让一下吧，总有一天会苦出头的。”迫于无奈，我也只得回厂。老板一见我們大多数已回厂，又起毒念，宣布把罗維湘、陈友松、陈如来等四个为首的斗争最坚决的学徒开除出厂。从此，我們又被关进了这座黑暗的牢監。由于沒有党的領導，这一次斗争失敗了。但是，我們对剝削階級和反动派

的嘴脸看得更清楚了，我們都在想：一定要和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我們的合理要求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今天的幸福是党給的

一年以后，上海解放了，我們这批受尽折磨的学徒终于盼到了太阳。当我自由自在地走出勤工厂的大門时，心里总在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1952年在“五反”运动中，我們斗倒了不法资本家李坤泉。1954年，政府逮捕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徐紹良。随着一系列民主改革，勤工厂的旧制度紛紛革掉了。我的工資从1952年就提高到六十九元，公私合营后的一次工資改革又增加到八十三元。我們的生活越幸福，就使人越发想起旧社会里一起受苦的小兄弟。工会帮我們到处发信，去找过去被老板开除出厂的几个学徒。可是他們有的回家以后被貧病折磨死了；有的在“二六”轰炸时被美蒋飞机的炸弹炸死了；罗維湘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招回来复工的只有两三个人。现在的勤工造纸厂还是座南朝北。可是，现在的学徒比起过去的学徒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啊！每当我看到他們自由自在地出进工厂大門的时候，看到他們在寬敞的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吃飯的时候，看到他們三年滿师，評級，升級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说：“今天的幸福是党給的！”

（澄海、惠卿、端阳 整理）